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毕加索传

The image features two white calla lilies in a black, rounded vase. The lilies are positioned in the lower half of the frame, with one in the foreground and another slightly behind it. The background is a deep, solid purple.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is clean and artistic, with a focus on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white flowers and the dark background.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世界名人传记

毕加索传

X X X 编著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从死婴到神童.....004
第二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014
第三章	漫游爱河.....031
第四章	进入政界.....051
第五章	芭蕾总给我带来厄运.....070
第六章	巴勃罗与《毕加索的奥秘》093
第七章	夕阳更红.....101

前 言

19世纪末期，曾以航海和斗牛体现探索和冒险精神的西班牙，为20世纪准备了一位非凡的艺术家——毕加索。

就在西班牙那海天一色的美丽城市马拉加，玛丽亚·毕加索望着活泼可爱的儿子，掩饰不住内心的骄傲与喜悦。她满怀希望地说：“这孩子，如果能参军入伍，肯定能当将军；如果从事宗教，可以成为教皇呢！”但儿子却拾起了父亲用过的画笔，借着从母亲那里获得的振聋发聩的姓氏“毕加索”，大声地宣称：“我想成为画家，所以我是毕加索！”是的，他的祖国西班牙产生过格列柯、香拉斯凯兹、戈雅等一代名师，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第二故乡法国也产生过安格尔、德拉克洛瓦、塞尚、高更、马蒂斯等一大批声名显赫的绘画大师，但毕加索并没有被这群璀璨群星的耀眼光芒所遮蔽，他以精湛的画技、对艺术独特的理解、对立体主义大胆的尝试、对人类自由与和平不懈的追求，在世界画坛上赢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

毕加索这个名字，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很熟悉。本世纪初，他创作了《亚威农的少女》，用他的画笔开

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创作的《格尔尼卡》，是记录战争灾难与人类悲剧的艺术丰碑；他为世界和平大会创作的《和平鸽》更是飞遍了全球，飞进亿万人的心中。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权威和泰斗，一生都在不倦地探索、创造、开拓，他创作的数万件油画、版画、素描、雕刻及陶塑等，如今仍倍受人们的青睐。

毕加索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并带有悲剧色彩的伟大艺术天才，一个创造者和毁灭者，一个20世纪的见证人。他一生保持着永不衰竭的多产能力和超凡的独创力与想象力，一生都在追求和探索。

毕加索92年的生命历程和艺术道路，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西方艺术的真正奥秘。

第一章 从死婴到神童

1881年10月25日夜11时15分，一轮冰盘似的圆月，早早地挂在了马拉加的上空，将那皎洁如水的月光洒在了梅尔塞德广场。梅尔塞德广场是马拉加市最主要的一个广场。从广场附近的小山上，不仅可以俯视广场上的纪念雕像和一大群时起时落的鸽子，而且还可以眺望全城风格独特的城堡式建筑和地中海优美的曲线。

离广场不远的一家医院里，唐娜·玛丽亚·毕加索·德·路兹生下了一个既没有呼吸也不会蠕动的瘦弱男孩。医院的助产士想尽办法要救活孩子，但没能成功，最后只好把这个没有生命的躯体弃置在一张桌子上。唐娜·玛丽亚的丈夫唐·何塞·路兹和家族的成员看见这个刚刚降临人世的婴儿浑身青紫，便对这个婴儿不再抱任何希望。但是，何塞的弟弟萨尔瓦多——一位医技高明的权威医生却不灰心。他俯下身子，吸足了一口雪茄，对准婴儿的鼻孔吹了进去，雪茄的烟雾顿时创造出奇迹，孩子活了过来。路兹家的第一个男性后嗣——后来取名巴勃罗的孩子，就这样，“一脸怪相，像公牛一样怒吼着”开始呼吸人世间的空气。

息。11月10日，唐·何塞在圣地亚哥教堂为新生儿受洗，孩子的全名是：巴勃罗·选戈·何塞·弗朗西斯科·德·保罗·让·尼波木切诺·圣蒂西马·特林尼达德·路兹·毕加索。然而，这一大串姓名除了在马拉加市政厅的出生登记簿上出现过以外，大部分在他的生活中自行消失了。世人永远记住的只是一个名字：巴勃罗·毕加索。

毕加索来到世界上不久，便显露出他与绘画艺术的天然渊源。他还不会说话时，就会用图画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他在纸上画了一幅“作品”，递给父亲看。父亲看着纸上缭乱线条，不知是何物。小毕加索居然发音含混地告诉父亲这是lorruela(一种甜饼)。一个尚未学会说话的孩子，竟懂得如何用图纸表达自己想吃糖饼的愿望，简直是个奇迹。

4岁时，他开始剪纸。剪各种动物，剪花卉，剪想象中的各类奇异的东西。除了剪纸，他有空就画铅笔画。他哑哑学语的第一个字就是“北”——“铅笔”在他的儿语中就变成了“北”。他喊着要：“北，北”，于是母亲就给他一支铅笔。

巴勃罗像所有的魔术师一样，需要观众，他的小表妹康查和玛丽亚是他的首批观众。她们看他如何从一张白纸变出各式各样的玩意，看得着了迷。她们冲他喊道：“我要一只纽芬兰狗！”“我要一只公鸡！”

玛丽亚要巴勃罗为她剪一些小毛驴。于是，他开始剪了，不管从哪开始，也不管是用铅笔还是用剪刀，最后变出来的小毛驴正是她们所希望得到的，带着一副滑稽样。

7岁时，他就在格朗奥古斯坦寓所的墙壁上创作了一幅水彩画：一只傲立庭院的公鸡——令人不禁要发“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之叹。

上学对巴勃罗来说，压根儿就是一种折磨。他是个一刻也安静不下来的孩子，最不喜欢各种校规，而且总是违犯纪律。巴勃罗最初上的是马拉加市的一所公立学校，但他总也打不起精神读书，作业本也马虎应付，能逃则逃，考试能躲则躲。父亲对此忧心忡忡，生怕他的前途毁在这里，于是想方设法替他转学。刚好父亲有一位朋友在圣拉斐洛学校当校长，毕加索因此被送到这所严格的私立学校。校长指示班主任对毕加索严加管束。然而，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巴勃罗最怕寂寞，厌恶学业，十分任性，心里有个什么主意，就想设法实现它。他开始逃课，布置的作业常常完不成。当老师或父亲翻开他的作业本时，常常发现上面画满了图画，而课堂布置的作业却被抛在脑后。

在学校，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教室的挂钟上，眼睁睁地看着指针的移动。脑子里总是想着回家的钟点，想着家里人会不会来接他。他时不时上趟厕所，或到

什么地方呆会儿，对请假他是百请不烦。在课堂上走神是常事，有时还会给老师画个像，画桌子，画钟表，随便画什么东西，只要不去学生字或背算数就行。

巴勃罗喜欢画鸽子，便把鸽子带进课堂，遭到了老师的批评。他一气之下拒绝再来上学。父亲赶忙找老师求情，最后总算对他作出让步，允许他将鸽子放在书桌里面，默不作声地照着画，以免影响其他同学上课。

1889年，年仅8岁的巴勃罗画了第一幅油画——《马背上的斗牛士》，画中骑在马上斗牛士和一旁助阵的观众都处于极度兴奋之中，人物性格生动而鲜明，构图十分巧妙和大胆，显示出孩子无拘无束的创造才能。这幅画既体现了儿童绘画的特点，也包含了毕加索成熟期的风格特征：不拘泥于透视、比例和明暗对比，牺牲或淡化细节来突出主要形象，主观任性地运用色彩。巴勃罗自己也说：“我从来没画过儿童画，从来没有，即使在我很小的时候也没画过。”

“后来，巴勃罗把这第一幅有纪念意义的油画终生保存在身边。”

1990年11月，他画了一幅素描《执木棒的海格力斯》，画上署名“巴·路兹·毕加索，并注上了日期。那时，油画和素描已经成为巴勃罗的手段，他用这手段展示自己的魔力，创造出自己的现实。”

1890年12月，也就是巴勃罗9岁那年，马拉加市政府为了节省开支，撤销了市博物馆馆长的设置，巴勃罗的父亲失去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也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工资收入。为了维持生活，唐·何塞急于找工作，只要有工作，哪里都行，即使远离心爱的马拉加市也行。他听说拉科鲁尼亚市新成立的达加尔达美术学校需要聘一名素描教师，立即决定应聘。1891年4月，他接到了聘书。

拉科鲁尼亚位于西班牙的另一端，濒临大西洋，汹涌的浪涛拍打着嶙峋的礁石，让人觉得好像到了海角天涯。全家人都在为这趟远行做准备，而唐·何塞此时最关心的一件事是，安排好巴勃罗的升学考试。他知道，没有一点后门关系的话，儿子说什么也不会通过考试的，而全家一旦迁往拉科鲁尼亚，就再也没有后门可走了。唐·何塞的一位好朋友是当地的主考人，他同意给巴勃罗出具必要证书，但为了掩人耳目，要进行一场考试。

假考试那天，老师给他出了几道极简单的加法题，而他还是全做错了。老师提醒他要集中精力。而他集中精力想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父亲的允诺：要能通过考试，就让他用油料画一张油画。主考老师让他把数字加起来，他一急之下，用几个数字画了一只鸽子。鸽子的眼睛是“0”，头和身子是两个“6”，翅膀

是“3”，脚下的树枝当作算式下面的横线。老师看了忍俊不禁，再看看毕加索那幅可怜相，终于动了怜悯之心，说：“好吧，算你通过了考试。”巴勃罗一听，高兴得像一只自由的鸽子，“嗖”地一声飞出了考场。

同年10月，在巴勃罗10岁生日的前后，唐·何塞带领全家登上了驶向拉科鲁尼亚的轮船。尽管唐·何塞对拉科鲁尼亚有点心灰意冷，时时有一阵怀旧的感伤向他袭来，但对巴勃罗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他绘画的题材范围也会因此而得到拓展。

后来，人们在巴勃罗作于拉科鲁尼亚的一幅铅笔草图上找到了从“0”到“9”十个阿拉伯数字。这幅画上有高一矮两个人，高个子身穿农民服，头戴宽边帽子，手拄文明棍，矮个子则是一个大脸的孩子。两人站在一起显得十分滑稽可笑，但更可乐的是，两人的形象中掺杂了阿拉伯数字，比如用横着的“8”画眼睛，用“7”来画眉毛和鼻子等等。可见巴勃罗不是不懂得数字，只不过将数字的语言化成了绘画语言。

毕加索进入了拉科鲁尼亚的达古阿达工艺学校，先学装饰画。巴勃罗开始了严格的画法训练，画石膏人体模型，用炭笔画右脚、左手、右腿。他的眼睛和他的手配合得非常密切。他画的那些素描显示出惊人

的观察力，考试成绩不是“优”，就是“优上”、“特优”。

回到家里，唐·何塞仍继续训练巴勃罗作画。他把一只死鸽子的双爪切下来，固定在一个板子上，让巴勃罗做局部写生，直到他满意为止。很快，巴勃罗就能在父亲的画布上为他画鸽爪子了。

在拉科鲁尼亚的日子里，他别出心裁地创办了一种画报式的书信，以此同马拉加的亲友们保持联系。他自任这份“画报”的经理、编辑、美编和记者，给“画报”起名叫《拉科鲁尼亚》或《蓝与白》，后者大概寄托了他对故乡蓝天白云的思念。他亲自画了种种刊头。在画报中，报道了拉科鲁尼亚的面貌和趣事。比如报道当地恶劣气候时，他画了一男一女挤在一起，雨伞和裙子在风雨中飞舞。文字说明是：风在刮，而且会继续刮下去，直到把拉科鲁尼亚刮个精光。他还在报画的封底正儿八经地登一些广告，诸如：求购纯种鸽子。地址：巴尤——高麦街14号，2楼。

如果说，一个人的实际出生地，是他第一次睁开眼睛时看到的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的地方；那么，除了风、雨和寒冷，拉科鲁尼亚就是巴勃罗的真正的出生地。正是在拉科鲁尼亚，他那天才的创造意识才萌发出来，他的贯注力也才被唤醒。也正是在拉科鲁尼亚，他第一次体验到了爱情的神秘。他永远都不能忘

记他的第一次爱情。

他曾深深地被这样一个故事迷住：在拉科鲁尼亚战役中，英国将军约翰·摩尔爵士光荣地战胜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但他由于受伤过重，也在战场殉身；临终前，他还喃喃呼唤自己恋人的名字。巴勃罗当时还不到13岁，但他的情欲就像他的天资一样早熟。他的班里只有两名女生，他选中了其中的一个作为自己的恋人。她名叫安格丽丝·蒙代兹·吉尔。巴勃罗把她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结合在一起，缩写成“安·巴”，签写在自己的课本上。他还梦想着进一步的结合，用“安·尼·路”的缩写来签名，意思是：安格丽丝·巴勃罗·路兹。而安格丽丝·蒙代兹·吉尔也被巴勃罗出众漂亮的外表所倾倒，尤其是他那双谁都想多看几眼的水汪汪的大眼睛，使她感到他就是她的一切。他们天真无邪的恋情没持续多久，就被安格丽丝的父母发现了，开始遭到非难。两位家长意识到，在这个边远的小城，他们半贵族式的家庭与那位新来的绘画教师的家庭间，社会地位相差太悬殊了。他们决心不再让女儿的感情继续发展下去，于是便在这对小恋人间设下了重重障碍。但还是没能阻止安格丽丝与巴勃罗的恋情，相反，他们的恋情越来越深，就当他们的书信传情，看来就要“海誓山盟”时，安格丽丝的父母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他们对女儿与巴勃罗同在一个城

市甚不放心，为了使女儿免受诱惑，便把她送到了潘普洛纳。在巴勃罗一册课本的尾页，紧接着安格丽丝缩写姓名的后面有一个字：“潘普洛纳”。

巴勃罗在给安格丽丝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爱情，这些都是至为重要的大事，是深深拨动了人心弦的秘密，在他看来能否保守秘密是衡量爱情是否忠贞的尺子。他开始怀疑安格丽丝不能严守爱的机密。他只有13岁，但在他身上，纯真与痴情已不复存在。他穷，没有钱，出身于社会底层，所以遭人白眼，被人拒绝，他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现在，他有理由去怀疑一切人，一切事物，甚至爱情。

1895年元月10日，巴勃罗8岁的妹妹康契塔死于白喉。巴勃罗对自己的这个满头金色卷发，常露笑脸的妹妹感情很深，他哄她玩，给她画幽灵像。妹妹死后，他便认定，上帝是灾难，命运即是敌人。康契塔的死，给他带来了两种神秘：权力的神秘与死亡的神秘，强烈地诱惑着巴勃罗，使他确信自己注定要作一个画家的命运，而且不论后果如何，他都应该勇敢地响应那上天赋予的权力的召唤。

终于有一天，巴勃罗开始模仿画家，试图出售自己的作品了。展厅设在一家卖服装和小百货商店的后间，事先还做了一则简短的广告，画没卖出去多少，主要是人们发觉这些画是出自一个还不到14岁的孩

子之手。然而，父亲却神情庄重地把自己的画笔和颜料送给了儿子。他所表达的方式是对一个13岁神童的畏惧。他不仅是这个神童的父亲，也是他的启蒙老师。但现在，面对自己所生的这个天才，他只有诚惶诚恐。

在拉科鲁尼亚的四年时间里，巴勃罗开始接触正规的美术教育并尝试了一些严肃的创作。更重要的是，他在心里上已为他的奋斗做了初步的准备。他可以扬起风帆，朝艺术的王国启航了。

第二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

1895年，唐·何塞通过工作对调方式，在巴塞罗那美术学校谋到一个职位。在举家迁往巴塞罗那之前，唐·何塞一家到马拉加度假，重温昔日的旧梦。

在马拉加，他们住在萨尔瓦多叔父家里。巴勃罗离开故乡时，还是一个考试总也不及格的小男孩；如今他又回到故乡，已经成为一名画家，并从拉科鲁尼亚带来了一批画，亲友们从这批画中看到了他那非凡的天资，无不心悦诚服。尤其是救过巴勃罗一命的叔叔萨尔瓦多医生，对侄子的前途寄予了厚望。

为了激发侄子绘画，他白天给巴勃罗五个比塞塔作零用钱，利用港口卫生局局长的权职在健康监查处找了一间画室，并特意雇了一名老水手作他的模特。

秋天，新学年开始之际，巴勃罗同家人一起抵达巴塞罗那，踏入了人生旅途的重要一站。到了巴塞罗那，这位震惊了马拉加的神童又变成了一名普通学生。在编造历史和狂妄自大的背后，掩盖着这个学生极不健全的意识。他无法适应学校的各项规章纪律，不愿上课，也不喜欢学校这类教育机构。如果让他做什么事，这事又是要求他而不是出自他的自愿，他就会愤

愤不满，把一件本来很简单的事情非办砸了不可。他既争强好胜又刚愎自用。若是在某些方面不能胜过别人，就把人家贬得一文不值；若是在某些事情上无能为力，便会把自己的无能吹嘘成光荣标志。

这时，巴塞罗那到处弥漫着反叛的情绪和无政府主义气氛。巴勃罗在初到巴塞罗那的日子里，画了一幅令人震惊的素描《基督祝福撒旦》。这幅素描反映了他内心的苦闷、矛盾与强烈的冲撞。巴勃罗踟蹰在巴塞罗那的街巷，流荡于各个咖啡馆之间，一种失落感油然而生。他与大他五岁的朋友巴拉斯经常光顾一家有歌女演出的咖啡馆——艾登音乐厅。逛妓院林立的唐人街，从一家妓院逛到另一家，当时他还不满15岁，却有着烈火般的性欲和施展才华的冲动。

1896年4月，巴勃罗在自己的画室里完成了三幅作品：《最初的圣餐》、《留平头的自画像》、《科学与仁慈》。他的《最初的圣餐》参加了巴塞罗那的全市美展，与该市的一些名作家的作品并挂在一起，同时展出。《科学与仁慈》一画参加了“1987年马德里全国美术展”，使他第一次受到社会瞩目和公众的赏识，后来又在“马加拉省美术展”上获得金奖。这幅画后来在叔叔萨尔瓦多的寓所挂了许多年，又转移到巴勃罗妹妹劳拉的寓所之中。1897年秋天，巴勃罗16岁，来到了马德里，进入西班牙最高美术

学府——圣菲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继续深造。但一进入校门，他又感到失望了。巴勃罗永远对学校教育感到失望。他受不了那里的空洞、教条和死气沉沉，他很少到学院来，除了去学校的画室，他几乎放弃了所有课程。他三天两头去马德里最著名的美术馆——普拉多美术馆，仔细观察、品味和临摹格列柯、香拉斯凯兹、戈雅还有提香、鲁本斯等人的作品。从这些本国的和外国的的大师们身上吸取养分、获得灵感。巴勃罗沉醉于璀璨明珠一般的名画之中。同时，也追踪那些“使美艳无比的土耳其女郎暗然失色”的马德里姑娘。他经常搬家，房东不知换了多少。巴勃罗不上课的消息传到马拉加。唐·萨尔瓦多和其他叔父、姨母们很快停止了他的经济资助。他们的原则是：对天才倾囊相助，对浪子决不姑息。只有他的父亲，继续“尽其所能”供养他。巴勃罗陷入了穷困潦倒的地步。

春天，巴勃罗病倒了，有人说他得了猩红热，有人说他得了胸膜炎，也有人说他得的是梅毒。几个星期下来，巴勃罗几乎脱去了一层皮。幸运的是他终于没被病魔杀死。等病一好利落，他便动身前往巴塞罗那，回到父母身边。很快，他就同巴拉斯一道离开了巴塞罗那，来到了巴拉斯的老家，一个叫奥尔塔的山村，在那里，他不仅恢复了健康，而且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八个月。巴勃罗此时对生活 and 生命本质

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创作了一幅名叫《阿拉贡人的风俗》的作品，并在马德里和马拉加的画展上再次获奖。

1899年2月，巴勃罗回到了巴塞罗那。这是他的“黑色时期”。去年12月，巴黎条约声明古巴独立；美国人攻占马尼拉，宣告了西班牙帝国的末日。巴塞罗那的大街小巷到处是复员的残废士兵，他们沿街乞讨，求人施舍。那些知识分子群情激愤，猛烈抨击西班牙的腐败衰落，主张无政府主义。巴勃罗的情绪低落、悲观。这一时期的创作作品中都有死神的出现或死神的幽灵。这时毕加索离家出走并住进了罗丝塔·迪尔·奥罗卖身的那家妓院。他的“黑色时期”构成了他的个性的几大要素——狂热的独立性、旺盛的活力及炽热的创造欲。巴勃罗从奥尔塔回来之后，经常出入一家名叫“四猫酒吧”的“卡巴莱”，那里到处弥漫着虚无主义、加泰隆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烟雾。当时巴勃罗年仅18，无钱无名，经常保持沉默，但一开口说话，总是锋芒毕露，妙语连珠。

“四猫酒吧”的朋友非常欣赏毕加索的才华。1900年的2月1日，在朋友们的筹划下，举办了他在“四猫酒吧”的首次展览。可惜出师不利，观众对此反应平平，外界对此也十分淡漠。从商业角度看更是收益甚微，卖出去的画少得可怜、价格也低得可怜。

现在，巴勃罗比任何时候都向往巴黎。巴黎，世界艺术的中心，现代主义的营垒。他用了好几个月时间，认真翻阅各种法国艺术杂志，研究斯坦兰和劳特累克的插画，从中吸收营养。动身之前，毕加索为自己画了一幅肖像，他在人像的眉毛上连写三遍“我即王国”。那是他的护身符，是他的权力的吉祥物，保佑他不受恐惧与怀疑的侵扰。

他有生第一次越过了西班牙的边境。

巴勃罗来到了巴黎，拍净衣上的灰土，背着画架和行李，与拥挤的移民一道，走进了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他举目无亲，言语不通，但他始终抱着“我不寻找，我只找到”的态度来面对巴黎这个目不暇接的大剧场。是的，他很善于找到，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竟接二连三找到了三个去处：一个是蒙帕纳斯大道上的首次战役路9号的画室；一个是诺尼尔在蒙马特尔区加布里埃路49号的画室；另一个是希普德鲁姆饭店，他和卡萨吉马斯在离开第一间画室后曾在这家饭店住过几夜，等候诺尼尔回巴塞罗那时把他的画室给他们腾出来。

10月25日，巴勃罗19岁生日这天，他写下了一句誓言：“除了适应环境之外别无选择：做你所能做的，因为上帝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他的活动范围要逾越加泰隆人的圈子是很不容易的，他经常光顾

伦敦路上的一家有名的妓院，在浓妆艳抹的那些妓女怀中提高自己的法语。在巴黎，当时深受法国青年人喜爱的是劳特累克的“新艺术”代表画家，他继承了印象派的画风，吸取了日本浮世绘的技法，描绘了一幅幅苦中作乐的下层生活图景。巴勃罗迷上了劳特累克的作品，并仿效劳特累克的风格，结合自己在蒙马特尔观察到的贫民生活及灯红酒绿的颓废生活，创作了抵法后的第一批绘画，其中包括那幅著名的《烘饼磨坊舞厅》。并卖掉了这幅画。

有不少加泰隆人被毕加索吸引着，皮尔·曼雅克就是其中的一个。皮尔·曼雅克是位艺术经纪人，30岁出头，留着小胡子，仪表堂堂，精力充沛，经营有术，乐于帮助青年艺术家，因此在巴黎艺术界颇有名气。通过诺尼尔的介绍，他结识了巴勃罗，提出每月150法郎购买他的画作，并担任他在巴黎艺术界的保护人和引路人。巴勃罗从此第一次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

曼雅克为巴勃罗在巴黎的生存负担起责任时，他却不感激任何人，以为什么都是应该的，甚至当人家赴约来到时，连门都不开，连最普通的礼貌也不顾了。他太依赖曼雅克了，这就使他产生了反叛的情绪，而且，这也是他打算离开巴黎的原因之一。巴勃罗是一个不断需要投身的人，他不断需要新的刺激，以使自

己主动地完全投身进去。他来巴黎的两个月中，为使自已投身于这个城市，巴勃罗拼命地倾注于工作，确实够主动也够刺激的了。现在，他准备回家看看。另外，圣诞节临近了，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城市是个外人。感到自己不属于巴黎，甚至也不属于巴塞罗那。但主要的原因却是为了他的好友卡沙格马斯。

卡沙格马斯曾经是巴勃罗在巴塞罗那的同屋。巴勃罗来巴黎时一路上与他同行。这个又高又瘦、留着跟巴勃罗一样头发的卡沙格马斯到巴黎后爱上了一位有着西班牙血统的模特儿，她叫吉尔迈尼·卡加罗。而吉尔迈尼轻浮的举止使卡沙格马斯深为痛苦，陷入心理矛盾。为了熄灭卡沙格马斯对吉尔迈尼的爱情之火，12月20日，巴勃罗带着卡沙格马斯动身返回巴塞罗那。这时，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处处令人生厌，这两位年轻人的长头发和不修边幅的外表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和厌恶。卡沙格马斯看到这一切，便按照自己的意愿又回到了巴黎，到妓院和卡巴莱寻花问柳。巴勃罗则留在了马德里。他准备到一个更大的游泳池去游泳，以便一展宏图。他决定在马德里闯出一条路来，寻找他在巴黎未能得到的承认与成功。曼雅克继续帮助巴勃罗生存，但巴勃罗的目标决非仅仅为了生存。他要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要使自己名震马德里，震撼整个世界。

卡沙格马斯回到巴黎后举行了一个晚会，被邀请的朋友中也有吉尔迈尼，在晚餐接近尾声时，卡沙格马斯哭着，掏出一支手枪。吉尔迈尼赶紧卧倒，射出的子弹只擦伤了她的后颈，卡沙格马斯又哭着举起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几个小时后，卡沙格马斯死在 hospital 里。

卡沙格马斯的死讯传到了马德里，毕加索大恸不已。他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内心仿佛被一个孤寂的亡灵所缠绕，挥之不去。一幅以死亡为主题的作品开始酝酿。这就是巴勃罗蓝色时期著名绘画《卡沙格马斯的葬礼》的来历。

作品完成后，最初的名字是“招魂”，后来不知怎么就变成了“卡沙格马斯的葬礼”。面对这幅呕心沥血的新尝试，巴勃罗寄托了自己对友人之死的哀思。在同一时期，巴勃罗创作了另一幅蓝色调的作品《蓝宝》。《蓝宝》所描绘的是盥洗室。墙壁、家具、浴盆、水壶、被褥和窗子的阴影全是蓝色的。整个房间笼罩着一种忧伤的气氛。

自从卡沙格马斯死后，巴勃罗愈来愈内向、悒郁，马德里的世俗生活已不再适合他的心境，于是，他动身回到巴塞罗那，狂热地投入了工作，不再去卡巴莱和妓院消磨时光。这就是巴勃罗蓝色时期的开始，也是精神上的转折期，他开始在艺术创作中寻求心灵上

的净化，而不是心理上的安慰。

1901年6月，巴勃罗回到了巴黎。离开这里半年，比起过去，他显得成熟多了，像脱胎换骨一样，把青春期的稚气一骨脑丢在了兰勃斯大道。他比以前更思念卡沙格马斯。现在，曼雅克又安排他住在克利希大街130号的画室。曼雅克安排他的生活，影响他的作品，但他对曼雅克控制的不满也在日益增长。他与曼雅克的关系日趋紧张，不仅是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是冲突的根源，巴勃罗的作品也越来越让曼雅克感到失望。他把巴勃罗出色地领入巴黎艺术界，而巴勃罗的作品却是没人要的那些表现痛苦与屈辱的绘画。要知道，这些东西毫无市场。巴勃罗的西班牙根太深了，他现在无法忍受孤独，开始想离开克利希大街的画室了。他要摆脱曼雅克获得自由。1902年1月，巴勃罗返回了巴塞罗那。回到父母身边时，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童年那种依赖大人的境地，这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极度矛盾，悲观失望。他的作品愈来愈变得绝望、痛苦。同年10月，巴勃罗重返巴黎。

巴勃罗的生活依然很穷困。他与诗人雅各布同住，两人只有一张床、一顶礼帽，只好轮流使用。白天，雅各布上班，他则睡觉；晚上，他作画，雅各布睡觉。

1903年的冬天，寒气逼人，巴勃罗连取暖的

钱都没有。为了抵御夜间的寒冷，巴勃罗不得不烧画取暖。熊熊的火焰吞噬了巴勃罗的素描和水彩画，也吞噬了巴勃罗的自信。尽管雅各布看了巴勃罗的手相并断言命中注定他有灿烂的前程，但美好的预言丝毫不能减除巴勃罗极度的绝望，他曾怀疑自己作品的价值，怀疑自己所走的道路。幸好这种悲观情绪很快就被接连不断的画展所排挤。

从1900年到1904年的蓝色时期，巴勃罗曾八次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往返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

在巴黎的蒙马特尔山的斜坡上有一个小广场，广场旁边很久以来就有一座破旧不堪的小楼房，在这座小楼里，曾住过高更这样的艺术巨人以及一大批最终未能成名的作家、画家、诗人。这座建筑物，很像塞纳河上妇女们曾经用来洗衣物的那种船，麦克司·雅各布把这座破旧的楼房称作“洗衣船”。这就是巴勃罗的栖身之地——拉维南路13号。自此，巴勃罗在这里开始了他的法国定居，并连续住了五年，开创了举世闻名的立体主义绘画。

巴勃罗在画室养了两条狗：一条叫盖特，是乌特里罗送的一条小孤（狗），他从巴塞罗那把它带到巴黎；另一条叫弗里卡，是一条混血母狗，他常把它拴在椅子上。抽屉里有一只白鼠，身上散发着浓郁的香味，使得满屋芬芳。“洗衣船”的生活条件是艰苦

的。本来就布满蛛网和灰尘的画室，没几天，就变得彻底脏乱不堪了。地板上到处是丢弃的烟蒂和用了一半的颜色管，画布随手乱放，床上、浴缸里，比比皆是。巴勃罗统治着这个王国，感到无比的自在。巴勃罗搬进“洗衣船”之后，很快，身边就聚集了一帮已在巴黎的西班牙人，他们照顾他的生活，同时，也在用他的天才温暖着自己。

“洗衣船”的生活犹如一连串的谈判——谈家具、谈食物、谈画布、谈生活。蒙马特尔区的街上到处是流氓和小偷，巴勃罗晚上离开画室时总是带上手枪，即使有枪，也还要有人陪伴。这样，麦克司¹雅各布就成了巴勃罗的影子，他与马努罗和安吉尔·德·索托一起，负责卖出巴勃罗的一些素描。

蓝色依然统治着他的画布，但鲜亮的玫瑰色开始出现了，这预示着他生活的一大变化。

“洗衣船”只有底层一个水龙头。巴勃罗在挥笔创作的间歇，常常注意到一位褐发碧眼的美貌法国姑娘在那提水。他几次想找机会与她接近，都没成功。他私下通过邻居打听到这位美丽的姑娘名叫费尔南德·奥莉维叶。

1904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瓢泼大雨，把正在广场树荫下乘凉的费尔南德浇得浑身湿透。费尔南德提着裙子，一路小跑，气喘嘘嘘地躲进“洗衣船”。

在过道里，巴勃罗抱着一只路上救起的小猫挡住了她的去路。他把小猫送到她的怀中——这既是奉献，也是介绍。他笑了，她也笑了，然后他带她去看他的画室。

走进巴勃罗的房间，她吃惊地发现，这里简直是一个杂乱的仓库。靠墙零放着许许多多蓝色的绘画。还有一幅刚刚完成的铜版画，画中一对夫妻正坐在桌旁吃饭，桌上放着一个酒瓶、一个空杯子、一个空盘子和一块面包，丈夫歉意地把头扭向一边，但一只手仍搂着妻子的肩膀，另一只手抓着她的手臂。弗尔南德看着这对艰难度日、患难与共的夫妻，心中有无限的感慨。这时，巴勃罗也将手搭在了她的肩上，托起了她的下巴，俯下头去……。她杏眼紧闭，浓密的秀发在抖动。

巴勃罗堕入了情网。事实上，这是他第一次真挚关系的开始，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委身一个女人。而她——弗尔南德走入了巴勃罗的世界，成为他的第一任正式情妇。

费尔南德·奥莉维叶1881年6月6日出生于巴黎，比在马拉加出生的巴勃罗大四个月。她天生美丽，天生聪明，天生富有创造性，也天生的懒惰。她喜爱绘画，但更喜欢用自己的创造力去创造生活。

巴勃罗很爱她。他喜爱她的风度和穿戴，她戴着

松软的帽子显得更加秀美。同时，巴勃罗也有着安达卢西亚人所特有的占有欲。以前曾为能否同她一起生活而担忧，现在，他又为他们能否总在一起而担忧。他对费尔南德无所要求，只指望她能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不指望她做饭，也不指望她收拾房间，更不指望她扫地板，而且，绝对禁止她上街买东西。费尔南德每天都是喝茶、看书、上床睡觉，没有什么家务活。隐居般的生活很符合她天生的惰性。这也是他们关系的基石。

和费尔南德在一起，巴勃罗长成了一个大人，再也不是那种只知在妓院追逐女人和只想着自己的轻浮少年。

巴勃罗给她画了几幅肖像画。他的笔触开始从抑郁的、冷冰冰的蓝色调逐渐变成娇滴滴、暖洋洋的玫瑰色。

玫瑰色的时期开始了。《马戏演员之家》和《坐着的裸女》是其中的代表作。《马戏演员之家》画的是一位演员在摇晃着他那干瘦的胳膊，向观众做着手势。他的身上穿一件镶有蓝边的粉红色衣服。蓝色尽管没有褪尽，但柔和的粉红色已经成了主要色调。此后，小丑和马戏团演员也成了巴勃罗这一时期经常描绘的对象。

巴勃罗执着地探索着，实践着，正当巴勃罗感到

精疲力竭并准备重新开始的时候，一个蒙马特尔的艺术家邀请他去荷兰度假。巴勃罗欣然前往，并在荷兰创作了《美丽的荷兰女子》、《戴帽子的裸女》等画。荷兰度假，是他创作中的一个值得欢迎的巨大转变，他已把那个已经衰落了蓝色王国抛在了身后。这个转变，也加速了他从贫穷向富裕过渡的转变。

里奥·斯坦因与吉尔特鲁德·斯坦因兄妹俩在巴勃罗生活中的出现，是他从事求人到无所需求的自由境界转变的一个先兆。巴勃罗初次遇见斯坦因兄妹是在克洛维·萨戈的画廊里，斯坦因兄妹买下了巴勃罗800法郎的作品，使巴勃罗意识到了别人对他创作的承认。金钱不是衡量艺术的绝对标准，但金钱将巴勃罗从窘困的生活中解救出来。他们从经济上支撑了巴勃罗不稳的地位。紧接着一位叫什楚金的俄国画商也光顾了巴勃罗的“洗衣船”，出手大方地买走了他的几幅作品。“洗衣船”门庭若市，来拜访巴勃罗和购买他的作品的人骤然增多。巴勃罗的作品价格也在直线上升。有一次，画商优拉德来到巴勃罗的家里，出价几千法郎，将巴勃罗的作品全部买走，看着那第一次变得如此空旷的画室，巴勃罗的内心涌出一丝成功的喜悦和开创艺术新纪元的冲动。

巴勃罗将新近得到的这笔巨款装进西服的内兜，与费尔南德一起启程前往巴塞罗那。

他对费尔南德的态度，无论是独自一人，还是与她在一起，心情都很舒畅。巴勃罗向巴塞罗那炫耀费尔南德，又向费尔南德炫耀巴塞罗那。但是，这样做并不能补充他那枯竭了的源泉。他必须走得更远，掘得更深。于是，他决定跨越巴塞罗那，同费尔南德一起到格索尔去。并在格索尔创作了《闺阁》。

八月初，他们回到了巴黎。回巴黎后，他还没从格索尔的梦境中醒来，就投入了《农民》一画的创作。并为吉尔特鲁德·斯坦因画了一幅肖像。这幅肖像画是巴勃罗第一次摆脱模特的作品，是巴勃罗艺术新方向的预兆。

巴勃罗非常喜欢塞尚的作品和思想。在塞尚的生前死后，巴勃罗几次徜徉在塞尚的绘画作品前。他耳边时常想起塞尚说过的话：要在自然中看出圆柱体、球体、圆锥体，把一切东西纳入适当透视。一个人对于自然不能太拘谨，或太诚实，或太驯服。每当巴勃罗想到这些，便有一种继续开拓的冲动撞击着他的胸口。他拿出西班牙航海家的探索精神和西班牙斗牛士的冒险精神，置刚刚到手的名利于不顾，在绘画中开始了超越事物的表象，追求事物的结构和本源的尝试。此刻，他考虑的问题是非洲艺术与东方艺术。

马蒂斯创立“野兽派”以后，黑人雕刻可算是马蒂斯带给巴勃罗的一个非同小可的启迪。黑人雕刻线

条简洁流畅，大多运用一些直线、弧线、几何图案勾画而成的，富有抽象美。而人物的表情通过眼睛显示了原始丛林的恐怖。巴勃罗被这件雕刻吸引了。那一段日子，只有在卢浮宫的原始艺术部与特洛卡代罗宫人种博物馆才能见到他。

黑人雕刻带给巴勃罗的震撼是巨大的。1906年秋，巴勃罗在兴奋之中创作了与他过去的画风截然不同的《两个裸女》。《两个裸女》的创作标志着巴勃罗对旧的画风的摆脱。

1907年春，巴勃罗坐在“洗衣船”里的画室里，苦苦构思着一幅反映巴塞罗那亚威农大街妓女生活的作品。好几个不眠之夜过去了，完整的草图出来了，五个裸女坐在夜总会的舞台上，柔嫩的粉红色肉体在蓝色的背景映衬下显得非常突出。整幅画的前景都是花与水果。经过四个月的修改，一幅尺寸巨大的《亚威农少女》诞生了。这幅立体主义的处女作和代表作像一颗炸弹投向巴黎画坛，引起了同行知己们的漠视、误解甚至抨击，布拉克公开表示不欣赏，俄国收藏家什楚金则感慨兮兮：“这对法国艺术是多么大的损失！”德兰还向“画商”肯惠勒揶揄挖苦地说：“我们总有一天会看到巴勃罗自悬于那幅大油画后边的。”

巴勃罗向着传统的突破，招致了更多的反对与误

解。他日益精神沮丧、渴望摆脱“洗衣船”，但又感到筋疲力尽，无法长途跋涉到南方去，于是，他在鲁德树林附近的一个农场找了间小农舍。这里环境优美，周围是地和树木，巴勃罗在这里心旷神怡。他的作品以风景为题材，绿色开始支配他“鲁德树林时期”的绘画。

1909年夏天，巴勃罗在绘画上的求索变得更加执着，他对宇宙万物的探究精神也比以往更加强烈。这时，他渴望西班牙、渴望奥尔塔，渴望十年前他曾在那里体验过的和谐与精神上的升华。巴勃罗与费尔南德再次来到巴塞罗那，他们只在那里逗留了很短的时间，便同巴拉斯一同前往奥尔塔。巴勃罗在奥尔塔又一次体验了生活的朝气，感到鼓舞和无比振作。但他和费尔南德在一起生活已不像以前那样愉快了。他们之间愈来愈疏远，费尔南德试图重新唤醒他的兴趣和往日热情，开始做一些不固定的家务事。但是，她在巴勃罗身上所唤醒的，却是他偶尔爆发的怒火。

第三章 漫游爱河

回到巴黎，巴勃罗迁到皮加尔宫附近克里希大街11号一幢宽敞豪华的画室公寓。但豪华舒适的生活并没能加深巴勃罗与费尔南德之间的感情。

1912年，巴勃罗在克利希大街附近的艾尔米塔什啤酒酒店认识了一位美貌、苗条的女子玛塞尔·汉伯特。玛塞尔的丈夫也是一名画家，叫马西库。马西库为了绘画整天废寝忘食，常使玛塞尔感到孤独和冷清。巴勃罗被她的温柔恬静所吸引，他内心炽热的火焰也点燃了玛塞尔的热情。不久，他们便各自背着自己的爱人，一块到亚威农谈情说爱，游山玩水。巴勃罗又一次堕入了情网。而费尔南德无法忍受巴勃罗移情别恋，就同一个未来主义画家私奔了。自此，巴勃罗与费尔南德长达十年的同居生活结束了。

巴勃罗与玛塞尔搬到亚威农附近的索古，开始了三幅油画的创作。他爱玛塞尔，并亲切地称她伊娃。伊娃在巴勃罗的生活中占据了大部分位置，他常在他的作品上签上“我爱伊娃”，“我的朱丽叶·伊娃”等字样。

巴勃罗从克利希大街搬到蒙帕纳斯区拉斯帕伊大

街242号，这也是他和诗人、画家以及像托洛茨基这样的政治流亡者聚集的地方。战争与革命的空气四处弥漫。环绕在他周围的暴力和腐朽搅得他心乱如麻。从他的作品《报纸与小提琴》、《瓶子、杯子与报纸》中可以看出巴勃罗所描绘的世界是病态的。

巴勃罗还在奋斗，他坚持画素描。渐渐的，巴勃罗的名声以其作品为前导，飞跃过法国的边界，传遍了慕尼黑、柏林、科隆、布拉格与纽约。1914年3月2日，在巴黎罗奥饭店举办的拍卖会使巴勃罗作为画家成功地打入了这一艺术市场。巴勃罗的天才变成了法币。

1915年12月14日，伊娃病逝，巴勃罗悲痛欲绝。情人的去世，战争爆发造成朋友们的失散，巴勃罗深深陷入了孤苦之中。正当巴勃罗苦闷之极的时候，具有天才鉴赏力的一位27岁的诗人、编导高克多邀请巴勃罗为俄国芭蕾舞团设计布景和服装，将立体主义与舞台艺术相结合。自从战争使巴勃罗孤苦伶仃以来，另寻门户的机会对他有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他答应了高克多的邀请，1917年来到意大利罗马，高克多编导的芭蕾舞《游行》带着巴勃罗设计的神奇布景和服装上演了。

在芭蕾舞团的演员中，有一位容貌姣好、眼睛里总有一丝高贵的忧郁的俄国芭蕾舞女演员引起了巴勃

罗的注意。使他忘却了伊娃，重新燃烧起炽热的情火。

奥尔迦·科科洛娃是帝俄一位将军的女儿，从小喜欢芭蕾舞，但成功之门却久久不向她开启。奥尔迦的异国风采，国度神秘，使她成为巴勃罗眼中迷人的尤物，成为他一见倾心的恋人。而奥尔迦则是想通过作巴勃罗的妻子以攀上她所渴望的社会地位。1918年，巴勃罗与奥尔迦在巴黎一座东正教教堂举行了一个俄国式的婚礼，实现了他们俩人的共同愿望。

战争结束了，一个现代世界诞生了。没有既定的方向，也没有幻想，一切都不同于往常，到处是怀疑和忧虑。历史的天平已从现存的秩序倾向背叛旧秩序的一方。“四猫酒吧”的朋友和“洗衣船”的叛逆者选中这个机会，活跃在古董商与拉波埃蒂路的现代画廊之间。

如果说巴勃罗是一个花花公子或一头社交的雄狮，一点都不过份。但是，至善主义与艰苦奋斗仍主导着他的性格。1919年，由巴勃罗设计布景和服装的舞剧《三角帽》在阿拉伯罕剧院首演，巴勃罗专门为卡尔萨文娜设计了一套服装，被演艺界称作是：“一件用粉红色丝稠和黑色花边作成的形式最简洁的超级杰作；它是超出人种学角度复制某种民族的象征。

“在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和热心的收藏家中，他纯粹是位天才。他使艺术天才具体化了，在一个追求进步观

念的时代里，他敢说自己作品并无进步可言：“我的艺术中所采用过的几种方式，不应该被认为是革新，或是向着未知的绘画的观念迈出的步伐。”他说：“我从来没有进行过尝试或实验，我无论有什么话要讲，都是以我觉得应该采用的方式说出来的。”

巴勃罗和奥尔迦继续出入社交界，但他从不向社交界摧眉折腰，只是偶尔才让别人高兴一下。正如米希亚·赛特说的那样：“毕加索不需要任何人，他从不像考克托那样设法讨好每一个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为《普辛耐拉》设计布景和服装。在他的周围世界里，他只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921年2月4日，奥尔迦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保罗。这时，巴勃罗为了设计第四出狄亚基列夫的芭蕾舞剧《弗拉门科舞》而倾注了全部精力。但舞剧并没有成功。不过，某一场演出的成功与否对巴勃罗来说好像与他没关系。他要去解放、去创造一个比生活更真实、更宝贵的现实，而且要单枪匹马地去付诸实行。

奥尔迦已变得臃肿不堪，怪模怪样。她也愈来愈强烈地专注自己，她那骄横的态度和无理的要求激怒了巴勃罗，使他加深了对饕餮女人的恐惧。

他创作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名作——《三个乐师》，它和传统的画法截然不同，但多少还能辨认出三个乐

师的形象。画中三个乐师的手都很小，中央是一个穿长衣服的丑角坐着弹吉它，左边是一个穿白衣服的丑角在吹小号，右边是一个穿黑衣服的僧侣式人物，他正在翻乐谱。《三个乐师》中，有音乐，有智慧，也有黑暗和恐怖感。

1922年6月，巴勃罗成功地设计了《安替戈妮》的布景。这是他第一次用红粉笔创造出大理石的效果和三根多立克式的柱子。在《安替戈妮》的评论中，考克托写道：“这些柱子的出现，那么突出，那么惊人，就像六步韵诗一样，是来自感官的活动。他创造这些柱子，就像当初希腊人发现它们一样。”

在他周围，人们费尽心机举办各种辉煌的晚会。而巴勃罗对于成功，就像凡高对于失败一样，几乎一无所有。成功是巴勃罗的命运，命运就是使他成为当代典型的艺术家的东西，也是凡高之所以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典型的艺术家的缘由。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写道：“别的艺术家为追求成功而顺应社交界，背离自己的初衷。毕加索从没做过这种事。”

1924年6月14日，巴勃罗设计的芭蕾舞剧《迈邱利》得到了勃拉克、阿拉贡等超现实主义者的赞赏。在《迈邱利》的设计中，巴勃罗已经和超现实主义者们汇合到了一起，追求一种起伏不定的幻想般的形式，来动摇强调客观性的现实主义。

随着社会地位和知名度的提高，奥尔迦变得越来越极端，以前她所关心的是上流社会对她的关心和崇敬，而现在她要在走下坡路的婚姻中抓住丈夫。而当她所得到的关心越来越少时，她怒不可遏，朝丈夫发泄。对于奥尔迦的做法，巴勃罗由生气而愤怒，由愤怒而狂暴。两人的裂痕越来越大。由此而诞生了《三个舞蹈者》。这是他对人体的狂暴肢解的开始。“他憎恨一切，同时也热爱一切。毕加索并非其人本身，他在创造自己。”这是圣贝诺瓦给考克托写的一封长信中所提到的。

1927年初，巴勃罗路过巴黎豪斯曼大街的一家商店，被橱窗前站着的一位少女迷住了。她棕色的皮肤，挺直的希腊式的鼻子，灰蓝色的眼睛，高高挺起的胸脯，有一种北欧女子特有的魅力。这位姑娘就是玛丽·德瑞丝。当时玛丽·德瑞丝只有17岁，她身上勃发着青春和力量，使巴勃罗无法抗拒。在玛丽·德瑞丝刚过完18岁生日的时候，巴勃罗背着奥尔迦，开始了与玛丽的秘密交往。

巴勃罗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无节制、最无顾忌的生活，而玛丽对巴勃罗绝对服从，是他独占的一件物品，是他力量和性吸引力的证明。这期间，巴勃罗用华丽的色彩，梦幻般的调子创作了许多幅玛丽·德瑞丝的肖像画。其中一幅为《坐在安乐椅中的女人》。

巴勃罗的声誉扶摇而上，又赢得了一位热情洋溢的新斗士——克里斯钦·则沃斯。克里斯钦是位年轻的希腊流亡者，《艺术备忘录》杂志的创办人，他要把一生献给巴勃罗作品编目的工作。“对毕加索来说，绘画就像尤里克的颅骨”，他在创刊刚一年的《艺术备忘录》上，引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典故说：“他不停地把它拿在掌上颠来倒去，带着迫切的好奇心。对于这个人的躁动不安，谁也理解不清。他掌握着绘画的全部真谛。他知道，绘画不包括这种或那种对物象的形式上的表现手法，但它又包含着所有的解决方式和无数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正是毕加索所不断追求的东西。”德国评论家卡尔·爱因斯坦同一年在写到巴勃罗的作品时，狂热地赞美他的艺术手法：“它的截然相反的成分形成了奇妙的和谐……真理存在于潜藏在对立事物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一致性中。”

在他的艺术中，真理确乎可能源于对立事物的紧张状态。但在他的生活中，情况却截然不同。他彷徨与奥尔迦的婚姻和对玛丽的情欲之间；他鄙视社交界的周旋，但又侧身其中。

这就是巴勃罗在生活中的写真。他把对奥尔迦、对生活和对上帝的憎恨、恼怒，都倾泄在他的画布上。在绘画中，他所反映的是隐藏在关于光荣的庆典之类新闻下面的深刻的不和，黑暗和丑陋。难怪艺术史家

威廉·茹宾说他可能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一位取代了那个维也纳医生的西班牙人。

1928年7月，巴勃罗带领奥尔迦、保罗和一位英国女佣第一次离开巴黎前往迪纳尔，在此之前，他偷偷地把玛丽·德瑞丝安排在迪纳尔附近的一个儿童夏令营里。巴勃罗为自己的精心安排感到十分得意，在儿童夏令营里，经常与自己的小情人幽会，使她完全屈从于自己的意志。巴勃罗很欣赏自己那位小情人丰满健美的身体划动在游泳池里或蹦蹦跳跳在沙滩上。而玛丽·德瑞丝的任务很明确：必须服从他的情人的奇妙而可怕的每一个要求，任他随心所欲。巴勃罗曾经说：“我很喜欢钥匙，它常常萦绕在我的心头，在我的一系列浴男浴女画中，总有一扇他们想用一把大钥匙打开的门。”长期以来，巴勃罗就希望某个女人会握有这把指点迷津的钥匙。但是，当时在主宰他生活的色情主义中，玛丽·德瑞丝并没有掌握这把钥匙，她充其量不过是供他任意驱使的奴仆。难怪40年之后，玛丽·德瑞丝承认说：“我总在毕加索面前低着头，对他哭。”

1928年，巴勃罗创作了不少以牛或马为性象征的作品。其中蚀刻版《人身牛头怪》中的怪物米诺陶是巴勃罗自己的象征，以此分析了他与玛丽的恋情。此时，华尔街的经济非常萧条，巴黎附近的艺术家都

在低价出卖自己的作品，而巴勃罗却以越来越高的价格继续出售少数他舍得出手的作品。

这个时期，巴勃罗总感到他的生活中仿佛有种东西恶毒之极，他不再迁就奥尔迦的好恶了。他为儿子画了最后一幅肖像：《拿着花扮成小丑的保罗》。在他的作品中，巴勃罗总是把他的女人们画成受虐待和被征服的布娃娃。像往昔一样，巴勃罗感到失望时常常转向基督教十字架的题材。1930年2月，他完成]了著名的《基督受难》。琳达·朗斯顿在他《毕加索作品中伪装双重肖像画之所容》中写道：“毕加索那隐晦的肖像画形成，是艺术家向公众忏悔其隐秘人格的载体。其主题是隐体的，因而也是隐蔽的。即：艺术家本人与他的女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其生平所透露给我们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作品旨在避免使观众洞悉其假象——斗牛和静物——以外的东西。”巴勃罗并没有为这些评论而受影响。巴勃罗越来越沉醉于三维空间的变形与物体的随意拼合。创作了玛丽·德瑞丝的雕像和一系列头像雕像。人物形象不断地被扭曲，被改变。

1932年6月10日，小乔治美术馆着手筹备他的大型回顾展，236幅作品从世界各地集中到巴黎，这些作品是他向统治世界的恶势力作斗争的战士。同年9月，另一次大型回顾展在苏黎世的昆斯托斯美

术馆开幕。在 21 8 万名参观者中有卡尔·荣格。他惊奇地发现巴勃罗的作品与他的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所画的画很类似。他认为巴勃罗是位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在《新苏黎世报》上发表文章说：“严格地说，毕加索身上的主导因素是精神分裂症，这使他把自己表现为割裂的线条，这是一种透过形象心理上的裂隙。它是丑陋、病态、怪诞和不可理解的。搜寻这些陈腐的东西不是为了表现什么，而是为了掩盖它，但这种晦涩并没有什么东西可去掩盖，就像笼罩在沼泽地上的寒雾。对于巴勃罗来说，他现在不是要掌握某种风格或选择媒介，而是要超越一切风格去创造一种绝对的和终极的东西。他有勇气创新，并不会受诸多不同艺术表现形式的影响。就像他说的那样：“我相信，观念、梦幻与现实，这两种表现矛盾对立的状态终将转变为一种超现实。”

1935年，玛丽·德瑞丝为巴勃罗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玛丽亚·德·拉·唐塞普桑。这是玛丽·德瑞丝已故的姑母的名字。玛丽·德瑞丝同巴勃罗的关系也转成了公开。随后，巴勃罗卷入了一场与奥尔迦离婚的官司之中。他在一个朋友面前曾说过：“牛的眼睛，有上千条理由保持缄默，对那喝多了咖啡而撒尿如雨的跳蚤，尽可视若无睹。”在这里，“牛”是他自己的代号，“跳蚤”显然指的是奥尔迦。正当巴

勃罗心乱如麻，感到很茫然的时候，退出了他的生活圈长达 21 年之久的费尔南德在《夜与迈丘利》杂志上刊登了她于巴勃罗之间回忆录的第一篇摘要。巴勃罗非常恼火，愤怒之下，他创作了四幅极有力而动人的铜版画《瞎眼的米诺陶》，在画布上，迸发出了自己全部的情绪。牛首人身的怪物又一次成了他自己的象征。

他想尽快摆脱奥尔迦，但由于巴勃罗是西班牙人，无法回到佛朗哥独裁统治下的西班牙去办理离婚手续，他们之间的婚姻只好以分居形式宣告结束。

巴勃罗始终是个孤独的人，但在一生中的此时此刻，他才真正体味到生活中“极度的孤寂”。他曾说：“你抛出一个球，希望它撞到墙上再弹回来，这样你还可以接住再抛。你希望朋友们会是一面墙，但他们几乎从来就不是一面墙。他们倒像是一块湿床单，你抛过去的球打在湿床单上，只不过滚到地上，几乎从不会弹回来。”

巴勃罗的爱情是变化多端的，对他来说，没有一种爱情是十全十美的，并可以成为永恒的。巴勃罗在与玛丽共同生活的同时，又将他爱情的触角伸向了别的女人。有案可查的包括欧吉妮亚、埃拉朱利斯和玛丽·吉多利。玛丽·吉多利是位法国议员的太太，喜欢收藏名画，在巴黎开有画廊。巴勃罗与她来往之后，

不少作品落入了她的手中，作为回报。她把巴勃罗的作品织进了纺织品中。

1936年，当巴勃罗与玛丽所生的女儿玛丽亚还不到半岁时，巴勃罗又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在圣日耳曼街罗艺内斯哥教堂的对面，有一家叫杜马高的咖啡馆，这家咖啡馆是布莱顿和超现实主义者们经常聚会的地方。在这里，巴勃罗遇到了一个叫亨利特·西奥朵拉·马尔科维奇的女孩。朵拉·马尔1907年出生在图尔，她的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一位有钱的南斯拉夫建筑师。父母带着她曾在西班牙居住过，懂西班牙语。朵拉·马尔当时的职业是摄影师，同时也是一位超现实主义画家。朵拉·马尔有一张有力而又有轮廓的脸，自然的黑发垂直披在肩上，乌黑的眼睛。她的美貌和才华、艺术上的灵犀使巴勃罗为之倾心。吸引巴勃罗的还有她玩的那套奇怪而可怕的游戏。他看着她摘下精绣着玫瑰花的黑手套，指甲上涂着鲜红的指甲油，拿起一把锋利的长刀，一次次把刀尖穿过指缝刺进桌面，刺不中时，便换个手指再来，鲜血染红了她修长而细嫩的手指。朵拉·马尔很热情而且很在行地同巴勃罗讨论让·科洛的摄影试验以及这些试验如何应用于他的创作，讨论他所考虑的技术例题和哲学问题。她与他的许多想法都能有相通之处。由于朵拉·马尔是位理智的女孩，她和巴勃罗保持着一定

的距离。

这时，巴勃罗童年时代的故友萨巴蒂斯从巴塞罗那来到了巴黎。他是应巴勃罗之邀而来的。从那时起，他的生活的道路便追随在巴勃罗的后面。

在决定划分财产的听证会上，奥尔迦向巴勃罗索要价值数百万的画。在这种境况下，巴勃罗无论对奥尔迦提出的经济要求的担心是什么，但在感情上，他再也不愿跨进画室的门坎，即使在启封之后(巴勃罗同奥尔迦离婚时官方用封条贴在了巴勃罗的画室上)。他不再作画，而去写诗。独自在极度的孤寂之中，希冀得到些微的新鲜感。房间里的东西乱堆乱放，他自己从来不动手打扫，也不让别人去动手，所以窗户从来不擦，地从来不扫。萨巴蒂斯说：“仔细观察他的怪癖行为，我有时认为，他可能不敢干什么活，唯恐一个随意的姿势会改变气氛，打破生活平衡，改变他的命运。”在生活的困惑时刻，他退隐到诗的秘密世界中去，常常把自己锁在洗澡间里用钢笔或铅笔头在藏在衣袋里的笔记本上写诗。他不能作画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折磨着他。他大部分时间是和萨巴蒂斯在一起度过的。至于玛丽·德瑞丝，巴勃罗曾讲过一个笑话：“有两个恋人，一个是法国人，另一个是西班牙人，他们共同生活，相亲相爱。后来她学会了他的语言，这时他才发现她是多么愚蠢。一段恋情到此也

就结束了。”其实，巴勃罗与玛丽·德瑞丝之间的关系倒不是由于语言不通，而是由强烈的性欲促成的，如今，往日的那种挚热的情感一去不复返，所以，巴勃罗感到，他的生活中缺少一位伴侣。

7月18日，共和政府与暴动的国民派分子之间内战的消息传到了巴黎。没过多久，年仅38岁的青年诗人加西亚·洛卡遭到暗杀大大震惊了艺术界。巴勃罗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共和派的一边，宣布支持共和派。

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有生以来第一次卷入了历史的潮流，他的孤独从此镶上了团结和归属感的花边。当西班牙政府要他担任普拉多美术馆馆长时，他欣然接受，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担任官方职务。巴勃罗制作了两大幅版画，配上了自己写的长诗。他把这套作品叫做《佛朗哥的梦幻与谎言》。八月，飞机开始轰炸马德里市。普拉多美术馆的珍藏不得不火速转移到较为安全的瓦伦西亚。

在戛纳后面的一个小山村的农舍里，一位比青春还有魅力的姑娘小心谨慎地等着巴勃罗的到来。这位姑娘就是朵拉·马尔。尽管性自由是朵拉·马尔超现实主义信条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她还是在女作家莉丝·德哈姆的农舍里等待，等待巴勃罗来向她求爱。从他们共进午餐之后，朵拉·马尔跨过了一座桥，从

一个独立女子的生活跨入了一个日渐依赖巴勃罗的正式情妇的生活。至于这种生活能过多久呢？谁都没有去想。

巴勃罗感到了一种重新开始的狂喜，一切都是新的。“我每换一个妻子，就把前面那个烧掉。”巴勃罗不止一次地说：“跟年轻的妻子在一起，有助于永葆青春。”的确，说“朵拉·马尔有着比青春还有魅力的东西”一点都不夸张，除了绘画、摄影和强烈的求知欲之外，朵拉·马尔对佛教、神秘主义和星象学也极有兴趣，艺术史家詹姆士·洛德回忆说：凡初次见到她的人，都会感到她的存在，感到她不是一般的人，她的眼睛闪着一种光辉，一种不寻常的明亮的光辉，声音很独特，像是鸟儿的鸣啭。”朵拉·马尔使巴勃罗获得了新的灵感，他放下了写诗，又回到绘画创作上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很高兴。他又开始和朋友们交往了，他有时用挤出的鲜花汁液作画，有时用软木塞做成小动物或小人儿，有时用烧过的火柴棍在桌布上凭想象勾勒出朋友的肖像。他拿起黑牙刷放在上唇，模仿希特勒发疯的样子。无论做什么，他都像个魔术师一样，把那些饱经世故的朋友们逗得张着嘴，像孩子一样着迷。那段日子里，他同朵拉·马尔以及埃鲁阿夫妇到当地乡间去寻幽探胜。有一次，他们偶然来到一个叫瓦劳利的小村庄，这里从罗马时代起就

是陶器制造中心。巴勃罗着迷地观看工匠们的制陶手艺：烘粘土、成型，然后在土窑里烧成成品。这时转向陶塑艺术已在他心中播下了种子。

回到巴黎，他和奥尔迦划分财产的法律诉讼已接近尾声。奥尔迦提出的一切要求令巴勃罗达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最后不得不在法律上妥协。这时，巴勃罗身边的萨巴蒂斯成了他的出气筒：他说他站在了奥尔迦一边，说他一事无成，跟着他只是借他的光而已，萨瓦蒂斯像头受伤的雄狮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带着美塞黛丝永远地离开了巴勃罗，离开了拉波埃蒂路公寓。萨巴蒂斯走了之后，伊内丝接任了管家的职责，她成了巴勃罗世界中的固定成员，在巴勃罗不时更换女人和住处的生活中，她是唯一的稳定者。

巴勃罗“快乐时光”的中心是朵拉。此时的玛丽·德瑞丝已经知道了她在巴勃罗心中的位置。虽然她为巴勃罗生了一个女儿，虽然她是他的正式的情妇，但明白她也不是永远不会是他唯一的情妇，她只能勉强而痛苦地接受这一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巴勃罗与朵拉·马尔去法国南部的小港安迪伯避难。在那里，他俩经常在夜间散步，痴痴地看着海上星星点点的乙炔灯——渔民们用它引诱鱼群。巴勃罗想起了故乡马拉加，不禁黯然神伤。回到屋子里一连好几天都在朵拉·马尔的

陪伴下专心致志地创作《安迪伯渔夜》。

1937年4月26日下午，德军轰炸了西班牙的一座巴斯克历史名城——格尔尼卡。在这个全镇居民只有7000来人的小镇上，炸死1654人，炸伤889人。巴勃罗在极度的愤怒和痛苦之中，唤起了狂热的创作激情。巴勃罗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举世闻名的《格尔尼卡》。

这幅画4米多高，约9米长，整整占据了两面墙壁。巴勃罗使用了大奥古斯丁街的最大房间，仍在高度上无法容放，只好让它斜靠墙壁。朵拉·马尔不离左右，连续拍下了该画创作的每个阶段。

使人震惊的不仅仅是画的尺寸，这幅以生与死、善与恶、和平与战争为主题的巨作，从内容到手法都是震撼人心的。整幅作品以白、黑、灰为基调弥漫着悲壮的气氛。作品中上方是一个装了灯泡、受了人工调配的太阳，太阳下面是一匹引颈哀鸣的马，一只长矛穿进了它的背部。马的身下倒着一位被撕成碎片的男人，他手上还紧紧握着一柄折断了的剑。图中的四位妇女，她们尖叫着，哀号着，有的正从着火的楼上逃跑，有的正抱着死去的婴孩仰天哭喊，有的无望地伸展着手臂……画的左上方，有一头立着犄角、冷漠无情的牛。后来，巴勃罗曾解释说：“画面中发出嘶烈哀鸣的马，是西班牙人民的象征，牛代表了人民所

受到的种种苦难，以及这些苦难所造成的暴烈恐怖气氛，反映了法西斯的暴行。”

巴勃罗的爱情生活和艺术风格是多姿多彩，变幻莫测的。但在他一生中，只有一件事情是不可更改的，那就是主持正义、追求和平。他说：“西班牙的斗争是争取消灭反人民、反自由的反动统治。作为艺术家，我的一生不外乎是为了艺术的长存和反动统治的消亡而进行不懈的努力，从我最近所有的艺术品中，我都明白无误表明我痛恨那个使西班牙陷入苦海和毁灭中去的军事集团。”

《格尔尼卡》于年底在巴黎国际博览会的西班牙展馆内展开，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评论家说：“《格尔尼卡》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信息。它的狂暴和焦躁是我从未体验过的，使我目瞪口呆，使我感到木然。还有一位评论家说：“在充满古代悲剧色彩的黑白两色长方形内，巴勃罗向我们宣告了时代的悲哀；我们所爱的东西即将消逝，它需要得到艺术家的深刻再现，向它致以最后的告别。”

《格尔尼卡》的力量是巨大的，巴黎博览会闭幕后，它开始了巡回展览。

在创作《格尔尼卡》期间，玛丽·德瑞丝在他的生活中已被驱赶到了边缘地带。取而代之的是朵拉·马尔。朵拉·马尔比巴勃罗更关心政治，她帮助他集

中表现祖国大地上发生的悲剧，使他的政治热情更加高涨。同他一起讨论他所使用的象征，甚至亲自动笔。

《格尔尼卡》不仅是巴勃罗天才的产物，而且也是他与他的悲剧缪斯朵拉·马尔的产物。正如皮埃尔·戴斯所说：“人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格尔尼卡》应归功于朵拉·马尔。

夏天，巴勃罗带朵拉·马尔去穆更度假，这次故地重游，使朵拉·马尔感到惬意。巴勃罗乘着那辆伊斯潘牌汽车常去的地方之一是尼斯，马蒂斯从1916年以来一直住在那里。他无法不贬低马蒂斯，可又无法不想念马蒂斯。忍不住常去尼斯拜访他。巴勃罗仿佛已经知道，无论承认与否，马蒂斯已经进入了一个秘密的和谐世界，而自己却不得其所。马蒂斯所追求的是“平衡的艺术、纯与静的艺术”，而巴勃罗的艺术风格是受苦受难，他们两人的艺术相差甚远，因此，马蒂斯就更加吸引巴勃罗。

9月，巴勃罗回到巴黎，着手于他的名作《哭泣的女人》的创作之中。这幅画画的是朵拉·马尔扭曲的面孔，对于情人的痛苦面孔作如此的变形，巴勃罗的解释很简单：“多年以来，我赋予她一种饱受折磨的形象，不是由于色情狂，我从中丝毫没得到乐趣，而只是听从于我所感受的一种幻想。”他说：“我不曾爱过朵拉·马尔，我之所以喜欢她，就仿佛她是个

男人似的。”的确，朵拉·马尔身上有着某些现代知识分子所独有的东西，为焦虑、困惑与不安所苦恼。但巴勃罗集中大胆地表现她全部个性中最为痛苦的部分。10月26日，在巴勃罗生日的第二天，完成了名作《哭泣的女人》，并以250英镑出售。

7月，巴勃罗与朵拉·马尔再次前往穆更。这时，希特勒在准备完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佛朗哥正意欲使共和派西班牙屈服，这是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但是，只有政治的紧张局势与巴勃罗个人的生活波澜碰巧同时发生时，政治才会对他发生重大影响。这次来穆更，他和朵拉·马尔刚到不久，玛丽·德瑞丝带着女儿玛丽亚也奔往穆更，一直干扰巴勃罗生活的奥尔迦也随后而至。巴勃罗处于了难以忍受的内心紧张状态。8月21日，创作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画中，圣母玛丽亚吞饮着儿子身上的鲜血，反映了巴勃罗在生活中对女性的感受——侵扰与磨难。

1939年新年刚过，巴勃罗的母亲唐娜·玛丽亚逝世。消息传到巴黎，巴勃罗很悲伤但没去哀悼。他说：“自己所爱的人死了，不愿再重新提起伤心事。”两个星期后，巴塞罗那失陷。巴勃罗内心的壁垒更加厚了，他写了一首诗《无边无际的虚空之中心》，觉得自己正在被拖入诗中那幽暗毁灭的深渊。3月28日，马德里陷落，西班牙内战宣告结束。

第四章 进入政界

此时，巴勃罗挂名担任了魁克基金会的受委托人、西班牙知识分子委员会委员等职，以他的声望支持失败的共和党人。一位年轻的西班牙共和党人马连诺·米该尔以政治秘书的角色进入了巴勃罗的生活，协调各方面向巴勃罗提出了要他支持的要求。魁克夫妇不断从美国寄钱给巴勃罗，通过他转给为西班牙难民开设在土鲁斯的医院。

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天空。8月23日，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战争已不可避免。全世界的每个国家，每个党派，甚至每个人都在极力适应这一现实，英国和法国开始进行动员，旅游者们逃之夭夭。巴勃罗也重返巴黎。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世界各地仍在举行他的画展。特别是11月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要举办他40周年创作回顾展，作为宣传的一部分。巴勃罗用了一天的时间，在大奥古斯丁路、里普斯路和弗洛拉咖啡店让布拉赛拍摄《生活》杂志所要用的照片。巴勃罗得知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经济紧缺，就捐出30万法郎，并用另外20万法郎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资助

开办了两个儿童救济中心。为此，他卖掉了自己一些本想保留的东西。

德国的闪电战争征服了比利时，并越过了“无法逾越”的马其诺防线，侵入法国。如今德军已兵临巴黎城下，继续呆在城里显然是冒险之举，巴勃罗决定乘火车回鲁瓦扬。

回到鲁瓦扬，他得知房子已被德军征用。他为他的画和雕塑作品的命运忧心忡忡。趁德国人都出去演习的机会，带了玛丽·德瑞丝动身前往特朗布雷，抢救出一部分油画和雕塑。此后，每逢德国人去演习，他们就急忙赶回去，从盗贼那里“偷回”一些东西。让巴勃罗感到无比愤怒的是一尊中世纪基督蜡像被德国军当作蜡烛烧掉了。

战争造成的愚昧、黑暗、仇恨和愤怒出现在巴勃罗的画布上。《梳发的裸女朵拉》是德军占领鲁瓦扬后巴勃罗最野蛮、最富于报复性的作品之一，战争继续改变着他的生活景象。6月12日，卡恩韦勒逃出巴黎，巴黎沦陷了。巴勃罗透过窗户目睹了沾满泥污的坦克、汽车、大炮及戴着钢盔的德国兵开进城来。他一边看一边骂：“多么愚蠢！多么荒唐！”

在德国人眼里，巴勃罗是一个“堕落的”艺术家，是佛朗哥的敌人。因此，他们经常来巴勃罗这儿搜查。有一回，德国人清查银行保险箱，当清点巴勃罗在银

行的藏画时，巴勃罗故意带两个德国兵在不同的房间到处转悠，不时地抽出一幅画出来，搞得德国兵晕头转向。一些画明明没查过，巴勃罗却说：“我们刚才不是看过了吗？”可怜的德国兵对这些五颜六色的绘画根本分不清哪张是哪张。最后，德国兵问：“这些画一共值多少钱？”“8000法郎。”巴勃罗轻描淡写地说，德国人居然相信了。事后，巴勃罗说：“法国人总以为没人敢冒杀头的危险去欺骗他们呢。”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来搜查的。有一些纳粹官员和评论家是想来结识一下巴勃罗。每当这些人来，巴勃罗总是把印有《格尔尼卡》的明信片塞到他们手中说：“拿着吧，这是纪念品、纪念品！”有一次，德国大使阿贝兹也来了，他看着《格尔尼卡》的照片问：“这就是你的杰作？”“不是，”巴勃罗回答说：“是你们的杰作。”

玛丽·德瑞丝和玛丽亚搬回到巴黎。每周星期四和星期六，巴勃罗就去看望她们。对玛丽·德瑞丝来说，巴勃罗的来访就是她整个的生活，她活着就是为了他的来访。其实，巴勃罗每次来到这里，大部分时间是为女儿画像，而不是和玛丽·德瑞丝在一起。但玛丽·德瑞丝一直生活在自己编织的幻境里，在那里只有她和他的情人，连女儿的位置都没有。她总是把一间空房锁起来，告诉玛丽亚：“爸爸在里面工作，

千万别去打扰他。”

1941年1月14日，巴勃罗完成了一个剧本——《被捉住尾巴的欲望》的首卷画。这是他的自画像：一幅鸟瞰图，画中一位老者，秃顶，戴一副眼镜，观众可以看到他在写什么。这个剧本巴勃罗只用了三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剧中没有同情、也没有希望。巴勃罗这一时期的所有作品，也都是这种格调，他的内心一片冰冷。冰冷，成了他的创作的核心，这体现在画布上对朵拉·马尔无休止的变形中，在朦胧的静物画中，尤其体现在雕塑作品《死神头像》之中。

这一年，雕塑几乎成了巴勃罗的主要活动。他除了雕塑一些女人头像外，还用小孩玩具车的残体做成了一只大鸟，但稍一凝视，就发现鸟嘴就是儿童车的前轮叉子。这类把戏中，最巧夺天工、妙趣横生的是一件名为“牛头”的雕塑作品。巴勃罗把一个旧自行车的车座和车把拆下来一拼凑，居然创造了一个简洁而生动的牛头。巴勃罗在完成这件雕塑之后满心欢喜地说：“谁一看它就知道是个牛头。”当然，巴勃罗也创作主题严肃的雕塑。

1942年，法国抵抗力量在聚集力量。希特勒入侵苏联后，法国共产党的力量得到了充实。早先反对共产党干涉艺术创作和个人自由的埃鲁阿也把意见放在一边，满怀热情地投入了共产党的武装和抵抗力

量的艰苦战斗中去了。他和巴勃罗圈子内的知识分子一样，为了国家的自由，并不介意站到无情专制的斯大林一边。当法西斯带来的战争恐怖达到顶点的时候，巴勃罗创作了与实物一般大小的雕塑《抱着山羊的男人》。事先，他曾为此创作了许多草图，但真正雕塑只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作品中，留着胡子的裸体男人表情极为紧张，不规则的表皮下肌肉绷得很紧，双手死死抱着山羊。山羊在拼命地挣扎，显得非常痛苦，但是不愿被驯服。制作过程中，雕塑曾由于头重脚轻而摇晃得厉害，后来山羊干脆从男人怀里“摔”了出来。巴勃罗将其修改后，翻成了石膏像，放在他的画室里。战争结束后，朋友们涌进他的画室，而迎接客人的就是这尊透着不屈精神的雕塑。这是后话。

巴勃罗开始在家里呆着，越来越不大去咖啡馆了。纳粹的巡逻队，飘扬在公共建筑物上的N字旗帜，朋友的失踪，玛丽·德瑞丝与朵拉·马尔之间的冲突——所有这些沦陷的可恶迹象都令他深恶痛绝，使他无心再去日耳曼大街。多亏伊内丝来了，她把大奥古斯丁路画室收拾得比以前更像个家了。巴勃罗的衣服使他越来越像个豪放不堪的皮西米亚人——肥大的裤子，破衣兜用别针连在一起，上衣翻领上用鞋带挂着怀表，几乎全秃的头顶上一只巴斯克帽。这和他在社交时期的高顶礼帽和红色印度腰带一样，是他的行头。不

过，他现在不是花花公子，而是人群中的男子汉。

3月27日，曾引导巴勃罗认真走上雕塑第一级台阶的玫里奥·冈萨雷斯死了，巴勃罗震慑了，他要通过七幅关于冈萨雷斯之死的油画来拔除他对冈萨雷斯的思念。巴勃罗说：“我没画过战争，因为我不是摄影家，不去寻找题材。但无疑，我当时的画中是有战争的。”是的，他的作品中确实有战争，不过，那是他内心里的交战，是他个人同整个世界以及同统治这个世界的敌对力量之间的交战。他内心的战争一直延续到世界大战之后。5月，巴勃罗创作了一幅高61.5英尺，宽9英尺的油画——《欧巴德》，又名《裸女与音乐师》。画中，一个无助的裸女躺在受刑架上，枯瘦的双臂反绑在颈后，形成一个屈服的姿势，脸上是受折磨的表情，腿被无形的绳索捆绑着，另一个女人坐在她的对面，弹着曼陀铃。这幅油画反映了他对战争的愤怒。

为了更好地了解巴勃罗的世界，或者说仅仅为了学会如何在他那个世界里生活，埃鲁阿请来了一位颇有名的笔迹学家。埃鲁阿交给这位笔迹学家一封巴勃罗的信，当然没有透露写信人的身份，那位笔迹学家看了之后说：“他使用树木……没有枝干，防卫着他那常与别人发生冲突的自身。他不愿为别人而毁灭。他强烈地爱着，又杀死他所爱的事物……他感到悲哀，

想通过纯创造寻求出路，摆脱他的悲哀和痛苦。他反复无常，脾气暴躁，刚才还无动于衷，转眼就暴跳如雷。”埃鲁阿惊呆了：“对于认识毕加索的人来说，这是给人印象最深的分析。”

巴勃罗曾经说过：“你要工作，就要针对什么，甚至针对你自己，这很重要。一幅好画，任何一幅画，都应该有刀刃般的锋利。”在生活中，他创造性地也应用了刀刃，正如他在艺术中一样。一次玛丽·德瑞丝到大奥古斯丁来找巴勃罗，正巧，朵拉·马尔也来了，玛丽·德瑞丝想要试试她的权利，他对她“深挚的和日益增长的爱”（巴勃罗曾写信告诉玛丽他对她的爱日益增长）所给予她的权利。她让朵拉·马尔滚出去，朵拉·马尔进行了反击。这时，玛丽·德瑞丝的怒气变成了勇气，她向巴勃罗要求她最想要的东西：同巴勃罗缔结永久的关系。朵拉·马尔像个委屈的孩子似地哭了起来。巴勃罗看到朵拉完全处于劣势，便走到玛丽·德瑞丝的面前，轻轻地搂住她的脖子，然后朝朵拉·马尔发表了他庄严的声明：“朵拉·马尔，你十分清楚，我唯一所爱的，就是玛丽·德瑞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超现实主义女传教士，就这样，变成了巴勃罗门前的一块擦鞋垫。朵拉·马尔被赶出以后，玛丽·德瑞丝拼凑起来的幻境被巴勃罗打破了。他对她说：“你应该知道我的爱情的限度。”说完便转

身而去。

巴勃罗开始了一个漫长的创作过程，恶魔般的女性继续闯入他的作品。他又在画朵拉·马尔。这次她被画成一个囚犯。他对马尔罗说：“对我来说，朵拉·马尔总是个哭泣的女人……总是这样。女人是受苦的机器。”到后来，巴勃罗画布上的朵拉·马尔便不再哭了，她连哭的发泄权利都没有了。画中，她大睁两眼，直视前方，全身被强忍不哭的努力所折磨。比哭更悲哀，更恐怖的东西在朵拉·马尔的表情中。仿佛压抑悲痛的同时也窒息了生命。

巴勃罗对现代的精神空虚表现得一目了然，时而冷嘲热讽，时而狂暴猛烈，因为他有切身的体验。在一个充满冲突的世界里，很少有人像巴勃罗一样敢于直面人生中的精神空虚，在这空虚中，剩下的只是无情与刻毒。所以，痛苦、迷惘、野性和愤怒，是他丰富的创造力的肥料和他那无所顾忌的坏脾气的温床。当然，他的精神并没有泯灭，只是仿佛精神已灭似地生活和工作。事实上，他常常特别喜欢关心那些以精神世界为自己生命中心的人。

1943年，当德国军还没被赶出法国的时候，巴勃罗在巴利卡的农村过着简朴的生活，每天做两次弥撒，写作、画水彩画。黑暗包围了巴勃罗，但并没有熄灭他的热情和他对爱的渴望。一次，他与朵拉·

马尔等朋友在加泰隆餐馆吃饭时，他被两个少女迷住了。一个黑发、黑眼、希腊式脸型，穿一条百褶裙，显得飘逸；另一个腰身很细，大大的蓝眼睛，戴着一条绿色头巾，容貌秀美而又聪慧机警。前一个少女叫热内芙·阿的科，后一个是弗朗索瓦丝·吉洛。巴勃罗的热情与渴望又重新燃烧起来了。他看中了弗朗索瓦丝。

弗朗索瓦丝比巴勃罗的儿子保罗小九个月，是个农业工程师的女儿，弗朗索瓦丝一生下来，父亲吉洛就决心把她培养成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并让她像男孩子一样长大。

弗朗索瓦丝从小喜欢读书，除了古典名著以外，还喜欢哲学。战争开始时，她正在学习法律。但战争和日益壮大的抵抗运动，使她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热内芙是梅洛的学生，她在弗朗索瓦丝弃法从画这件事上起了作用，那晚在加泰隆餐馆，在巴勃罗目不转睛地看弗朗索瓦丝的同时，弗朗索瓦丝也认出了巴勃罗。巴勃罗很热情地请她和热内芙去参观他的画室，并明确地告诉她们说：“如果你们来，尽管来，但是要来就别像到麦加朝圣似的。要因为喜欢我这个人，和我在一起觉得有趣，要因为愿意和我结成单纯而直接的关系而来。要是只想看画，那就请到博物馆。”热内芙回米迪去了，弗朗索瓦丝单独来到

大奥古斯丁路的画室。每次，巴勃罗都找个借口把她带到一边去，躲开那伙聚在一起的来访者。几天之后，巴勃罗在给她看雕塑工具的时候，突然，在她的嘴上吻了一下，自此，弗朗索瓦丝走进了巴勃罗的艺术殿堂，同时也走进了巴勃罗的生活，拉开了他俩的爱情序幕。

弗朗索瓦丝很难适应巴勃罗周围这个互相猜忌、不露真情的假面世界，但适应他本人并不难。她的性格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的阿丽儿极为相像——是大自然中水、空气等流动元素以及精神力量的体现。她说：“巴勃罗比我父亲还要大，他立什么规矩，或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并不使我感到奇怪，我同意或不同意，都只不过是心里想一想而已。因为我想以他的年纪而论他是有经验的，最了解一切，而我可能有点不太听话。当时我们很相信我们之间还没有真正的冲突。”对巴勃罗来说，弗朗索瓦丝是个奇迹，是个奇妙的机遇。能做他孙女的年轻姑娘能表达出那些早慧的看法，一种敬意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1944年2月，巴勃罗和弗朗索瓦丝一起动身去旅行。这时，他最老也最好的朋友麦克司·雅各布在圣贝诺阿被捕并被解送到德朗西拘留营，当朋友们提出营救的时候，令人震惊的是巴勃罗竟一声不吭。不久，麦克司·雅各布死于狱中。

在德军占领期间，巴勃罗无论在黑市餐馆吃饭突然遇到搜查，或是非法用青铜浇铸雕像，更为严重的是在向国外运货币时被抓住，总会有人把事情掩饰过去。德国的一位大使说：“谁若敢碰毕加索一下，全世界的新闻界就会闹翻天，把你搞得不知东南西北。可以看出，巴勃罗的传奇力量。但当麦克司·雅各布向他求救时，他却没有利用这种力量搭救朋友，使雅各布免于死，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背叛，既背叛了麦克司，也背叛了他自己。当麦克司的追悼仪式在圣洛什教堂举行的时候，巴勃罗也去了，但他像个路人一样在院里转圈，却没有走进教堂，他怕受到什么牵连。

8月25日，巴黎宣布解放，也预告了巴勃罗生活的转折。他不再只是驰名世界，也不再只是个传说，他已成为战胜压迫取得胜利的象征。而巴勃罗历来喜欢象征却不喜欢现实，他不是英雄，却成了纪念碑，可与埃菲尔铁塔齐名。一位美国记者说：“毕加索和戴高乐将军一样，是在解放后的法国享有殊荣的人。”

不久，美国名作家海明威来访。海明威曾在1936年至1939年参加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发表过剧本《第五纵队》、特写《西班牙的土地》和小说《老钟为谁而敲？》等反映西班牙人民斗争生活

的文学作品。在1937年7月，海明威同苏联作家爱伦堡、法捷耶夫及阿·托尔斯泰等人在马德里组织和召集了一次国际性的作家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法国作家马尔罗、特里斯丹·查拉等人。在筹办这次大会时，本来打算邀请巴勃罗参加，但没有实现。这次，海明威随同美国军队来到巴黎。当他来到巴勃罗在大奥古斯丁路的住宅时，适逢巴勃罗到德瑞丝那儿。因此，海明威没见到巴勃罗。海明威深感遗憾，准备写一张字条给看门人。看门人习惯于人们留下礼物，便问他是否有什么礼物留给牛首人身怪。海明威回到汽车取来一匣子手榴弹，下面写着：“海明威赠给毕加索。”

海明威这个礼物是意味深长的。实际上，巴勃罗在整个战斗期间一直是以战士的姿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

在战时，巴勃罗的画室是反法西斯战士常常聚集的地方，因此，德国秘密警察和盖世太保也没有停止过对巴勃罗的迫害。他们时时刻刻盯着巴勃罗。但巴勃罗从来不把他们当回事，有一次弗朗索瓦丝去见巴勃罗，发现他正同法国抗德运动的领袖之一、名作家马尔罗谈话。巴勃罗告诉弗朗索瓦丝说，马尔罗是秘密地从游击队那里来见他的。

许多去大奥古斯丁路拜访的人只能等着，弗朗索

瓦丝曾数过，有20名美国兵睡在画室周围，但真正使她心烦的是，一次她骑车穿过克利希广场时，看到巴勃罗和他那只野性未退的鸽子的合影在一本杂志的封面上。她说：“我突然感到鸽子和巴勃罗都被驯服了，可以任全世界仔细看和抚摸了。”

10月，巴勃罗在阿拉贡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并在《新大陆》报纸发表文章《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他说：“参加共产党是我的全部生活，全部合乎逻辑工作的结论。因为，我骄傲地声明：我从没有把绘画当作单纯消遣的艺术或是逃避。我想通过绘画和色彩，作为我的武器，深入了解世界和人，以便使这种了解一天天地越来越能够解放我们每一个人。我想以我的方式说动我认为最真实、最正确、最美好的事情。这些年来可怕的压迫已向我证明，我不仅要以我的艺术来斗争，而且我要以我整个的身心来斗争。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加入共产党。”巴勃罗通过入党获得了一种舒适、快意的共鸣感和许多掌声。他希求逃脱放逐的痛苦和自我专注的令人窒息的牢房，享受一种归属感。

许多人涌向大奥古斯丁路，索取这位最近入党的名流的亲笔签名。尤其是那些有艺术头脑的小资产阶级女学生，迫切地等待一瞥这位大艺术家的尊容。其中有一位叫热内芙·拉波特的少女是在埃鲁阿引导下

到大奥古斯丁路去的，当时只有 17 岁，是费内隆国立中学的学生。拉波特是大学生民族阵线费内隆分会的主席和报刊编辑。《费内隆之声》是她命名的。她正是以这种资格见巴勃罗的。要求他解释他的艺术，她说同学们对此不能理解。巴勃罗非常恼火，冲她吼：“不懂？你是要看懂！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幅画成了数学上算式的求证！绘画不是为了解释——我很想知道，你到底要它解释什么？一幅艺术品不应当是一件使人无动于衷的东西，一件只让人路过时扫上一眼的东西，而是要在观众的心中激起热忱。唤起欣赏者心中的感情。它必须有强烈的反响和感受，并因此而创造，只要是在他的想象中应该让他从麻木状态中警觉过来。”当巴勃罗向拉波特展示他的党证的时候，拉波特问他：“你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吗？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吗？”巴勃罗作了否的回答。拉波特读了很多书，想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加入了共产党，她在共产党发行的小册子里读过波利策尔写的一些文章，甚至还读过带有深红色封面的斯大林的文集和《联共党史》。在反对德国纳粹统治的抵抗时期，她参加了大学生民族阵线，这使她有机会结识巴勃罗，并跟很多其他的共产党也有所接触。就她个人而言，能与共产党队伍里的同志们相聚，的确是件令人不胜欣慰的事情。然而，巴勃罗和拉波特在许多方面的看法都未

能得到统一。巴勃罗甚至都没有想到翻一翻有关共产党方面的书籍。他对拉波特没怎么解释他的艺术，倒一再解释他的政治：“你要知道，我不是法国人，我是西班牙人。我反对佛朗哥，为了让人们知道我的态度，唯一的方式就是照明心迹——我参加共产党这就宣布我与佛朗哥不共戴天的立场！”

不久，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种恋情。有时，弗朗索瓦丝在大奥古斯丁路碰上她。“我给她取了个绰号，”她回忆说：“瑞士奶酪，她是个个子高大而结实的姑娘，她不断地给毕加索带来奶酪！”

朵拉·马尔仍是巴勃罗的正式情妇，而巴勃罗开始把他的过去介绍给弗朗索瓦丝。起初他向她谈他的往事，后来就给她看往日的遗物。一天下午，他和弗朗索瓦丝来到蒙马特尔的最高处。下了汽车，他们走进了“洗衣船”，“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他郑重其事地告诉她。他指出胡安·格里斯的画室，麦克司·雅各布的屋子，最后指出自己的画室，他说：“我们只消打开这扇门，便又回到了蓝色时期。你天生是生活在蓝色时期的。你应该在我住这儿的时候遇到我。如果我们当时相遇，一切都会十全十美了。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都不会离开拉维南路。和你在一起，我永远都不想离开这里。”这是第一次，弗朗索瓦丝理解了“洗衣船”对于他的意义：“那是奋斗的时期，

在奋斗中有意义，有希望，什么都可能的——甚至幸福。”他还告诉她，他的一位画家朋友当年为了一个女人而在这里自杀，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他教给弗朗索瓦丝这生活的一课和他通过作品要教给全世界一样：生活中有这么一大部分是腐朽、退化和死亡。

1945年2月，他开始创作一幅同一主题的画：《尸体存放所》；白色桌子底下放着一堆破碎的尸体，旁边有一只空饭锅和一只空水罐。有人说这幅画是“毕加索作品中最令人沮丧的”；也有人称它是“一幅没有悲哀的圣母抚抱耶稣尸体图，没有吊唁者的下葬”；无数艺术评论家和艺术爱好者都一致认为：纳粹集中营的恐怖是巴勃罗创作这幅画的灵感。正像要教给弗朗索瓦丝生活的一课一样，《尸体存放所》只是部分真实。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对复活这一重大胜利却不屑一顾；表现的只是纳粹的恐怖，而没有表现对它的胜利。这再次表明了他的观念：黑暗最终极的现实。

创作这幅巨作是件规模很大的工程，一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画这幅画，尽管如此，在秋季沙龙开幕时未能及时完成，在抵抗运动和艺术展览展示时也仍未能最后完成。出席这次展览的共产党荣军事务部长劳伦·卡萨诺称赞说：“伟大的艺术家在我们的英勇行动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现代艺术因素。”无论官方怎

样说，巴勃罗的党内同志还是对他创造出这种艺术议论纷纷。巴勃罗对此置若罔闻。他说：“即使他们不想要我，我也不离开党。”

“既然你加入了共产党，如果德国人要回来，你怎么对他们讲呢？”考克托趁吃晚饭的时候问他。巴勃罗显得很骄傲，他说：“不过德国人不会再回来了。”他表现的像一个很好的社会名流，出席群众大会，发表多半是和埃鲁阿相似的讲话，而重要的是要接见来访者。

他的名言历来是“勿与掌舵者谈话”。他问杰洛姆·赛克勒：“你们相信我吗？我是共产党员，我的绘画是共产主义的绘画。”他又补充说明：“但如我是个鞋匠，我就没必要专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用榔头钉鞋子来表现我的政治了。”他希望自己的话能够清楚地表明他一直没脱离现实。”我一直处于现实之中。”他重复说。他的朋友们认为：是他在各个时期里相当准确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狂热和矛盾，但只是反映了这些矛盾，并没有画有什么有助于人们对时代的理解。难道巴勃罗的艺术真的只是明白地表现了本世纪的不满吗？巴勃罗在《法兰西文学报》发表报道说，他认为他的艺术是按时代的艺术家重大事件的形象创造其自身的，他说：“你认为是什么人呢？难道当画家只会看，当音乐家只会听，若当个诗人在心中就只有一

首歌的低能吗？……恰恰相反，他同时又是个政治的人，他不断关心世界上激动人、启发人或使人幸福的事情，以其形象全部地创造自身。怎么能对别人不感兴趣呢？一个人凭着什么样的象牙之塔式的冷漠，才能远离给你带来如此丰富内容的生活呢？不，图画不是为了装潢房子的，它是向敌人进攻和保卫自己的武器。”

朵拉·马尔已经知道巴勃罗的生活中有了弗朗索瓦丝。但自己被别人取代这一事实她仍不能接受。她已深深地沉溺在巴勃罗的生活里而不能自拔了，她使自己完全彻底地依附于巴勃罗，实际上断了所有的退路。因而，无论她的痛苦多么剧烈，他的冷漠使她多么难堪，她的时日都在一只茧中消磨，那里唯一的现实就是他，在电话机旁等待他的召见，无论身在何处，只要他打个招呼，她立即赶到他的住处，或在家中接待他。一天下午，巴勃罗向她宣称：“我的短处别的男人也有，我的长处任何人也没有，我不知道干嘛要你来，去逛妓院要更开心。”终于，朵拉·马尔遏止羞辱和痛苦的堤防崩溃了，她的情绪一泻千里势不可挡。“作为艺术家你可能是卓越的，”她对巴勃罗说，“但从道德上来讲你分文不值。”朵拉·马尔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住进了精神病医院。

巴勃罗对弗朗索瓦丝说了朵拉·马尔的不幸，并

为她从中引出一番教训：“现在总要比以前好，那是你的胜利。”但是,从朵拉·马尔的遭遇中弗朗索瓦丝所得出的教训大相径庭。她对巴勃罗表示了她的忧惧，她对他说：“我认为这故事闪动着痛苦的警告。”弗朗索瓦丝不无恐惧地看到了尼采的无爱的超人哲学。“爱是最孤独的一种，”她说：“我开始看出巴勃罗的性格中有些方面很古怪，开始显露出性虐狂的性格。”

巴勃罗并未感觉到他暴露了自己的可恶的一面，以及在弗朗索瓦丝身上所产生的影响。他约她和朵拉·马尔一起去度假，她一口回绝，并表示她决不会在他这场以女人斗女人的游戏里充当角色，巴勃罗开始发觉她不是一件任他随心所欲摆弄的乐器，而是在力量上能够与他分庭抗礼的年轻女性。他倒是喜欢她的力量和独立性。

弗朗索瓦丝的朋友热内芙想尽各种办法要她离开巴勃罗，始终没能说服弗朗索瓦丝，最后，热内芙无奈地对弗朗索瓦丝说了句“你在梦游中走向毁灭”便回到蒙贝利尔去了。

第五章 “ 芭蕾总给我带来厄运 ”

弗朗索瓦丝和巴勃罗同居了，这期间，她大部分时间给巴勃罗作模特儿。1947年5月15日，弗朗索瓦丝为巴勃罗生下一个男孩，巴勃罗开始给孩子起名巴勃罗，而弗朗索瓦丝却认为：“奥尔迦生的儿子叫保罗，而西班牙语中巴勃罗的意思是保罗，所以，她不同意她的孩子叫巴勃罗，她想起历史上有位画家叫克劳德·罗吉，于是，孩子就起名为：克劳德·皮埃尔·保罗。巴勃罗同意了。

克劳德的降临造成了弗朗索瓦丝和巴勃罗关系中新的扭曲。他以后向热内芙·拉波特承认说：“拖着一个带孩子的女人，对我来说是占有，它有助于消灭任何感情。你想象不出，我是多么不断地想要解脱自己。”

巴勃罗经常去看斗牛，看完之后，便回到昂带布博物馆，去画《尤利西斯和塞壬》那幅三联画。这时，他仿佛也听到了自己的塞壬之歌。

乔治和苏珊·拉米在瓦劳利开办了一间陶器工作室，他们在8月份到儒安湾来请巴勃罗去看三件小作品，那模子是巴勃罗前一年做的，现已烧好，等他去审查。他去了，是和热内芙·拉波特一块去的，并留

在那里开始工作。

巴勃罗为了要看试样，便带上了眼镜；拉波特也凑了过来。一时间，车间里只听得见机器的运转和纸张掀动的声响。巴勃罗仔细地审视着试样，像负责印制的工人师傅。热内芙·拉波特在一旁默然静候着。“画面的颜色太深了，颜色应调得淡一些！”巴勃罗最后表示说。一位工人师傅便在巴勃罗的直接指导下，非常仔细地把调好的颜料涂在石版的上面，然后再进行试印。这一番事前准备工作中呈现的焦虑不安的气氛，真有点像等待一个婴儿降生时的情景。几分钟过去，每一道工序是慢不可耐；最后总算可以重新试印了，但效果还是差强人意，于是又再次调色，再次不厌其烦地动手试印了好几遍，直至巴勃罗完全满意为止。

一位协助巴勃罗工作的制陶业技师，同热内芙·拉波特谈起巴勃罗如何得心应手地塑造出各种生动的形象。他说他看到那些坚硬的材料在巴勃罗的手指下，变成为富有弹性的人物形体时，不禁为之倾倒叫绝。这个技师还惊奇地发现：尽管毕加索的双手从事过多么粗糙的劳动，可是手上的皮肤居然还很光滑。对此，巴勃罗本人也觉得奇怪，他说：“我的这双手什么东西都接触过——木材、石膏、石块，什么都碰！”热内芙·拉波特顺之补充了一句：“还有……女人。”

“可是你要知道，我跟绘画打交道，就没有像跟女人打交道那么容易惹事生非。有一次，竟有人这么跟我说：‘您有一副苏丹的灵魂，您需要有一所伊斯兰式的后宫。’”巴勃罗看着热内芙·拉波特的眼睛说：“说真的，我倒巴不得自己是摩尔人或者东方人……东方的一切都吸引我。如果把东方比作为一块精美的大面包的话，那么整个西方及其文明，只不过是这块面包的碎屑罢了！”他还说自己喜爱描绘“穷乡僻壤，野岭荒山”。

其实，巴勃罗有时也对自己的艺术的价值产生过疑虑，并且怀疑其道德的力量，而其他的各种不同的思绪，也会触发他的愁思，引起他的不安。巴勃罗转向陶瓷，这是从空白画布的苦恼中的一种逃避，特别是在无所成就的时候。他和陶器工、泥土工混在一起，吸取他们的能量和技能，以使自己重新获得活力，增加自己的力量。这是一种新的表现渠道，巴勃罗不仅仅做装饰，而且还把手中的陶器加以变形，花瓶变成猫头鹰、女人或女神，使人想起古代偶像。巴勃罗的多面性，他的活力，他的锐敏的观察力以及他的神奇的创造力——如今都获得了新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而使世界震惊。原作的复制，更使人感到震惊。

自从巴勃罗与奥尔迦分居后，奥尔迦对巴勃罗的骚扰就一直没断过，她开始拿弗朗索瓦丝出气。她骂

她、打她、掐她，而弗朗索瓦丝能够体谅她的不幸和孤独，并不反击，只是要求巴勃罗给她另找一间房子。

他们搬家了，搬到拉加洛斯的座落在瓦蒂利两英亩大山坡中间的相当难看到的一所小房子，在这里过的几乎是完全公开的生活。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拜访他。那时他积极地投身于陶器制作，厌倦了包围着他的奉承与谄媚。巴勃罗越来越喜欢克洛德了。因为这孩子长得越来越像他。当克洛德两岁的时候，巴勃罗决定再要一个孩子。他对弗朗索瓦丝说：“你知道你需要什么吗？治好心怀不满的女人的良方就是要她生孩子，你再给克洛德生个妹妹吧。”不久，弗朗索瓦丝真的又怀孕了。

自从巴勃罗加入共产党后，就更加热情地投入到社会活动和政治运动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已结束，但世界局势变化仍然动荡不定，东西方之间发生的“冷战”意味着世界正孕育着一场新的大战。巴勃罗同爱好和平的人民站在一起，用画笔代替武器，向战争势力作斗争。

1946年底，在印度支那发生了新的战争，反对战争保卫和平成了法国共产党的宣传主题。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写信给巴勃罗，要他参加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几天后，波兰驻巴黎大使馆派人来见巴勃罗。1948年8月25日，巴勃

罗动身前往波兰，参加在弗罗茨瓦夫由共产党召开的知识分子和平大会。巴勃罗是西班牙人，没有护照，而他又拒绝接受佛朗哥政府签发的护照，波兰驻巴黎大使馆特地安排他不用持护照就能直接飞往波兰。为了保证他不会改变主意，在他动身的三天前，佛朗哥政府发给他一块银章，作为他为和平大会做出贡献的奖赏。他带着马采尔去了，并呆了两个星期。前四天在华沙参加大会，参观了三天，在格拉斯哥两天，最后六天又回到了华沙，参加宴会和庆祝大会。华沙记者们报道了参加大会的知名人士。

在格拉斯哥，巴勃罗参观了格拉斯哥市的查多里斯基博物馆。在那里，巴勃罗看到了历史名画——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穿貂皮的女人》和朗勃兰特的《撒马利亚风光》。这个博物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关闭，这次是特地为巴勃罗等人的到来而开放的。

同行的苏联作家和艺术家对于巴勃罗的作品是无法理解的，在他们看来只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才是唯一可取的；而巴勃罗的那些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方法乃是“资产阶级的腐朽艺术的表现”，所以与巴勃罗到格拉斯哥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曾经问巴勃罗：“你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些无法理解的形式呢？”巴勃罗意味深长地反问法捷耶夫：“请你告诉我，在学校读书时，老师是怎样教你发音的？”法捷

耶夫说：“例如 B-A，念 BA。”巴勃罗说：“好极了！老师也是这样教我读的。但是，有人教过你怎样认识绘画吗？”法捷耶夫笑了笑，只好承认自己太僵化了。

在华沙开会时，智利政府无理监视诗人巴柏罗·聂鲁达。巴勃罗为此发表了抗议声明。9月2日，波兰总统向他颁发“波兰复兴纪念章”，以表彰他为国际文化交流和加强波法人民友谊所做的贡献。

在华沙巴勃罗成了该市的荣誉市民。他从华沙飞往巴黎，停留一周后回到瓦劳利。在外的三个星期内，他没有给弗朗索瓦丝写过一封信，正在怀孕期间的弗朗索瓦丝感受到了自己的痛苦，但她还是很强烈地爱着他。当巴勃罗回来后问她是否想他时，弗朗索瓦丝很平静地告诉他说：“如果我愿意没有爱情并沦为奴隶，那么我是爱的奴隶，而不是你的奴隶，如果我的爱终结了，我的奴隶地位也就告终。”

在波兰参观期间，雕刻家来敬尔·西马送给巴勃罗一只猫头鹰作纪念，巴勃罗把它养在家里，当他看到它时就产生了灵感，他把猫头鹰看作凶恶的战争势力，与此相反，他把鸽子看作和平的象征。4月19日，第二届和平大会在巴黎召开。在和平大会召开的前一天下午，阿拉贡想为世界和平运动选一幅切题的图画，巴勃罗就让他画室里自行挑选。阿拉贡选中了巴勃罗在一月初完成的一幅很精美的石牌画《家鸽》，

并宣传这是只野鸽。当时阿拉贡兴高采烈地说：“多美的鸽子啊！这正是和平所需要的形象啊！”就这样，巴勃罗手下的鸽子起飞了，并展翅飞遍了世界各地。头巾、手绢上也出现了她的形象——背景上还衬托着四种不同肤色的、象征各民族的侧影，保罗·罗伯逊所灌的唱片上，也印有她的风姿；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帕美琳写道：“这位出了名的毕加索为和平运动创作了和平鸽。这个符号有着国际的力量，艺术的力量，无论是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这一点，而且还有他声誉和名望的力量。”

一夜之间，巴勃罗成了攫取公众的形象。由一个与天地交战的人变成了一位和平之士，这是在他往日的生活中不曾有过的，也是在别的画家所不曾有过的。《人道报》是共产党的机关报，该报刊登了巴勃罗的各种照片。

也就在当天晚上，弗朗索瓦丝为巴勃罗生了一个女儿，当正在开会的巴勃罗听到消息后立即给他这个还没见面的女儿取名——帕罗玛。帕罗玛就是鸽子的意思。三个星期后，保罗给巴勃罗生了个孙子。

弗朗索瓦丝把精力集中在孩子和家庭上，身体越来越糟，也很快地从青春期跨入成年期。此时的巴勃罗把她抛在一旁，开始充分发泄欲望，搞诱奸，无休止地去征服，醉心于他的嬉戏，醉心于逢场作戏的风

流事，尤其不断地证明他的男子气。这期间，巴勃罗完成了他的雕塑《山羊》：两只陶制的牛奶罐子当作奶头，一根棕榈枝作脊梁骨，柳条编的废纸篓作肚子，而它的两只角则是用葡萄藤作的。他说：“艺术家要放眼于一个更高的现实，他的作品就是呼唤。”

1950年，朝鲜半岛发生了战争，巴勃罗愤怒地谴责美国发动的这一场残酷的战争。他创作了《在朝鲜的残杀》，画中的屠杀者是一群机器人的形象，它们象征着由“现代文明”武装起来的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左边被杀的是一群和平人民，他们是赤身裸体的妇女和孩子。这幅画非常尖锐地揭露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并蕴含了极其深刻的嘲讽风格。也是对美国在朝鲜进行干预的强烈抗议。

弗朗索瓦丝已感觉到他离她很远。她隐退到她自己的世界里去了，而巴勃罗又把他的热情转向了热内芙·拉波特。弗朗索瓦丝发泄的主要途径就是哭。有一次，巴勃罗对着正在哭的弗朗索瓦丝说：“我当初遇到你的时候，你是一位维纳斯。现在你却是一个基督，而且是一个罗马式的基督，露出一根根的肋骨，都可以让人数得出来。我希望你知道，你现在并不那么让我感兴趣。别的女人生孩子之后总会有所改善，而你却不然。你看上去像一只扫帚，你以为扫帚会招人喜欢吗？”此时关于巴勃罗的风流韵事已开始见诸

报端。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对弗朗索瓦丝来说最清楚不过了。她说：“毫无疑问，当我决定和巴勃罗同居时，伴随着我对他的爱是崇拜的，是一种要背叛我所受的资产阶级教养的强烈欲望。同时我已意识到我对巴勃罗的感情其实只限于一般的理解，这特别令人感到卑微。至于报纸上所报道的情况，是巴勃罗故意让我知道的，你想，如果他真想搞那种事，他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进行，因此，我必须面临抉择了。”她觉得无助而孤单，一心想跟巴勃罗谈谈，可他每天都要去看斗牛，根本就不给她时间和机会。弗朗索瓦丝知道第三者就是那个被她称为“瑞士奶酪”的姑娘——热内芙·拉波特。

热内芙·拉波特和巴勃罗相识并产生恋情时，她只是一个17岁的小姑娘，她想旅行美国，于是，在巴勃罗的帮助下，在一个隆冬岁末之际实现了这个远游计划。六年之后，也就是1951年，领略了圣热尔曼代普雷和罗斯鲁热等处的优美风光及周游了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热内芙·拉波特回来了。很自然，拉波特的到来就意味着巴勃罗和弗朗索瓦丝爱情的结束。

对于热内芙·拉波特来说，自从他们认识的那一天起，可以说他们之间始终是闪耀着阳光的。巴勃罗

送她一些早年头发覆额时的照片，并在上面题词：掌心中的太阳。其实在拉波特心目中，巴勃罗本身就是一轮太阳，用他自己全部的热量照射、灼热，甚至于融化一切靠近他身边的东西。她说：“巴勃罗一向害怕受人束缚，凡是可能成为他生命中盘踞的东西，他一概都要将它除去。所以，他现在变得孤僻，是毫不足奇的！”巴勃罗则对她说：“我从来做不到潜心自省，也从来没有人能管束我。我还总是为了于无意中得罪他而惊叹慨喟——这也许是出于懦怯。就拿弗朗索瓦丝来说吧，尽管我与她从未有过真正的爱情，但她仍然是一杯充满着回忆的酒——我既不想喝这杯酒，又不愿意砸碎这只杯。我究竟应该如何是好呢？”

“爱情须是感情逐渐的积累”，巴勃罗曾不止一次地对拉波特说：“但愿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他的这些话，引起了拉波特一种莫名的悚然之感。她知道巴勃罗正在为幸福而恐惧；为某一种份外的幸福而感到恐惧？她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巴勃罗于是露出温和的微笑，并轻轻抚摸了一下拉波特的后颈，无限柔情地安慰她说：“在我过去的爱情生活里，总是夹杂着令人烦恼的伤心事……现在，我才第一次感到幸福。”经他这么一说，拉波特不安的情绪才稍微平静。

10月25日，瓦劳利全镇庆祝巴勃罗70岁生日。拉波特一直没见到马采尔。当她去格朗奥古斯坦

街的巴勃罗寓所时，却看见马采尔忧心忡忡地在一边坐候巴勃罗吩咐什么。伊内丝告诉她说：“马采尔事先连招呼都不打擅自把奥兹穆拜尔(巴勃罗的专用轿车)开到了多维尔倒霉的是这回竟出了个大车祸！先生为此大为恼火，你能在先生面前替马采尔美言几句吗？”就在此时，巴勃罗从屋里出来把马采尔叫了进去。马采尔不多一会儿便退了出来，显得垂头丧气，一言不发。巴勃罗看了看拉波特，脸色阴沉地问她知道出了什么事，拉波特说知道并趁机想为马采尔说一下情，但还没等她开口，巴勃罗就抢先说话：“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车子都没了，还要司机干什么！”拉波特唯恐没能理会他的意思，便追问道：“你是说，在修理期间用不着司机了？”“车子都被撞得散了架，根本无法修理——已经报废的货。所以我说，再也用不着司机了！”就这样，跟随25年的马采尔走出了巴勃罗的生活。而巴勃罗对此却无动于衷。车祸之后，那辆一直被封存在车库里的伊斯帕诺牌的旧车，又重新得到启用，而司机的工作，便落在保罗身上。保罗的性格开朗，心地宽厚，又有点漫不经心。他对汽车很感兴趣。保罗的脾气随和，对于父亲偶发的火暴性子，也不大放在心上。

弗朗索瓦丝30岁生日的时候，巴勃罗的生日礼物告诉她：女人生过孩子后，意味着一种新的拥有，

但同时也预示着旧日的脉脉温情将趋于泯灭。弗朗索瓦丝没做什么表示，她只是拼命地工作，以此打发那无精打采的时光。巴勃罗的言行不再那么严重地伤害她了。她已学会逐渐把自己的一部分隔绝起来。她说：“有一种缺陷出现了，但是起初我甚至没有注意到。我曾努力地抑制我所感到的背叛和痛苦，在这个过程中我砍去了自身的和我们关系的一部分。”她生来所受的教育就是要把尊言和自制放在很高的位置上，现在她继续维持着他们种种形式的生活，只是不提自己的痛苦，不提自己的任何要求。她变得更加疏远他了。

弗朗索瓦丝在她的工作中和她的孩子身上正在找到自己。她每天花数小时的时间给克洛德和帕罗玛画素描和油画。她画帕罗玛发困时的样子，在一块三合板上用水粉画克洛德穿着泰洛德的衣服坐在地上的样子。甚至把那只新弄来的小狗也画进去了。

她非常喜欢她的小女儿，她给母亲和外祖母的信中说：“我给这位最美丽的人中最美丽的孩子画了一系列挨在我身边的素描，我还是在写生，而且在试图把她那难以言状的清新中散发出来的诗意描绘出来——小小的脑袋，一幅路易·大卫描绘的姿态，两撮眉毛，眼睫毛像迅飞的小鸟，完美的睡容，这些同在她身边的那个比实际上的我更痛苦更忧虑的女人形成对比。我很快画出一张又一张的素描，以此来解放自

己，我的画唱着它们一行行诗句般的歌曲。我在工作的热情中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幸福，因为这不是一个发现某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或新词汇的问题，而是把自己完全奉献出去。我的思想也得到了充实和澄清。”在信中，她没提巴勃罗。巴勃罗仍继续在法国四处出击，除了和热内芙·拉波特在一起外，就是看了这场斗牛又看那场斗牛。他为自己的这一癖好寻找到正当的理由。他说：“我之所以爱好看斗牛，是因为借此可以窥见斗牛士临场时的准备情景。他们每个手里都有自己设的神龛，里面供着圣像、章饰……真好看——谁要是见到，都一定会喜欢的。”

当著名的斗牛士路易·米该尔·多明更向他请教“一些绘画的基本见解”时，他认为画画应该有自身的自由和自发性，他对多明更说：“到时候你会突然意识到，无需借助任何外部的帮助，你就已经学会了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在此之前，我可以对你解释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一点儿用。”巴勃罗所相信的东西很小很小，但是他的确相信绘画中某种本质的自然状态。他对海伦·帕美琳说：“艺术，正是艺术扼杀了我们。人们不想作画：他们在凭借艺术。人们要想要艺术，于是他们得到了艺术。但是，画里的艺术越少，绘画本能也就越多。”

“尽管毕加索的艺术是科学的实践，但是由于它

的直观性而几乎被忘却了。他的艺术又重新结合了人类孩子气的涂抹，那时绘画还不曾成为一种语言。”

1952年10月，莫里斯·雷纳尔在《论坛报》上写道。在同时，巴勃罗正在为瓦劳利的小学堂创作壁画系列《战争与和平》，在这些画上，他的艺术真的“重新与孩子气的涂抹结合起来了”。首先，他开始画《战争》：“我从右侧开始画，那些外省的棺材，一路上艰难地颠簸，你可以在小镇的街道上看见，多么可怜，发出刺耳的声音，画上其余的都是围绕这个形象来画的。”在《战争》这幅画中，有一匹正带着挽具的马；而在《和平》一画里，鸟笼里画上了鱼，而水族宫中却画上了鸟——一种对于无限的可能性的肯定。他在画《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他赞叹地对考克托说，马蒂斯从来没有屈服于老年的古板。他想确定自己也没有屈服，这是挫败死亡的又一种方式。斗牛是另一种方式，斗牛者和死亡的决斗是他自己的决斗。他说：“斗牛士永远看不见他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他没有机会像一位作家或画家那样修改它，他也不能像音乐家一样听它，他只能感觉它。只能听人群对他的反映，当他感觉到它并且知道这是一件伟大的作品时，它就会抓住他，以至于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无所谓了。”在画室里，巴勃罗懂得这种迫切性，懂得这种全神贯注的精神，他在那以生和死作赌注的舞台

上使之再现。他对周围的每一个人所作的毫无批评的颂扬不屑一顾，但是，他越来越怀疑自己作品的方法和力量。他开始把作品的价值和他所能卖得的钱数划等号。他心中开始有一个悬念，那就是：他的艺术所具有的价值，它已经到达的高度，今后的命运……换而言之，将来，我们的后人对他的作品将如何评价？这种疑虑与期望，使他感到痛苦。

弗朗索瓦丝在生活中面临着某些非同寻常的难题，她和巴勃罗在一种更加突出的相互对峙的状态下生活在一起。当她告诉巴勃罗自己“没理由呆下去”的时候，巴勃罗的作法好像是在表示愿意给她一切可以离开的理由。他开始在乡下东奔西跑，把自己弄得形容憔悴，疲惫不堪，还时常问弗朗索瓦丝是否还想离开他。他和拉波特在一起时对她说：“我内心充满矛盾……我在对某些创作满怀喜欢的同时，又会中了疯磨似的予以摧毁……对于爱情，亦是如此：在抱有生儿育女的愿望的同时，又往往会萌发摆脱妻室羁绊的念头。一个孩子的降生，既向我预示爱情的结束，感情上的摆脱，但同时又在我的身上结上了许多道义的、责任的纽带。”他的脸色变得很严肃，“你知道吗，我觉得负有责任！”他还表示，让拉波特为此作证。他还对她说：“你知道，在我过去的爱情里一直夹杂着痛苦与厌恶——如同被捆绑在一起的两个人，拼命

地扭动着身体，要挣脱束缚……而跟你在一起，则始终是温柔、甜蜜，就像一个没有蜂群骚扰的静谧的蜂房！”他说话时，脸上的神情变得更加庄重严肃。那段时间里，巴勃罗和拉波特几乎全在乡下生活。拉波特自称她是毕加索生活中唯一情深意密的爱人，或者说是最后一个爱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热内芙·拉波特也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巴勃罗生活圈里的一个多余的累赘和不太合格的诗人而已。尽管巴勃罗曾为自己流过泪，甚至还说：“我从来没有为一个女人哭泣过”，而现在，巴勃罗已擦干了眼泪离开了他们那个“幸福的天堂”——一家他们经常约会的饭店。热内芙·拉波特明白巴勃罗对她感到了厌烦。在他的感情世界里，她只不过填补了一下他那段时间感情上的空缺。她也知道，还有好多女人在排队等候他。

热内芙·拉波特在感情上深受损伤，慢慢的，他们之间开始出现裂痕，每次相见，沉默代替了以前的顾盼传情、情意绵绵。有一天当拉波特牵了一条狗去找巴勃罗时，巴勃罗很自然地告诉她：这儿不是玩狗的地方。从此，热内芙·拉波特不得不退出巴勃罗的生活圈。但她始终相信她曾得到过巴勃罗唯一的深爱。他们分开好久好久以后，她和巴勃罗的这段短暂的风流事一直是她生活中的大事。显然，对热内芙·拉波

特来说，宁可被他的太阳“化为灰烬”，也胜于离开他的轨道而苟全于世。

此时弗朗索瓦丝对巴勃罗的爱也在消失，如今她盼望他不回家的心情，就像当年盼望着他快快回家的心情一样的热切。从童年时候起弗朗索瓦丝就有一种信念，认为某些东西的神圣性取决于它们的完整性。她不能忍受身边的任何东西有缺口。母亲的劝告是：如果她这么担心东西被弄坏了，就应该把它们保存在箱子里不用。她解释说：“我永远做不到这一点，我越是喜欢一样东西，我就越想天天用它，如果它破了或是有了缺口，我就扔了它。对于巴勃罗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关系不再有某种完整性，如果他已蜕变为无足轻重的东西，那么我宁可一无所有。我知道这不是对生活的一种非常成熟的看法，但这是我的感觉。“尽管有这种感觉。在秋天，她还是继续帮助巴勃罗筹备在罗马和米兰举行的毕加索作品大型展览。

弗朗索瓦丝对巴勃罗的疏远，使巴勃罗的生活陷入单调、孤独之中。这时，一个叫杰奎琳·洛克的女人出现在巴勃罗的身边。

杰奎琳是鲁西荣人，小个子——至少比巴勃罗矮两英尺——长着一对淡褐色的大眼睛。她刚刚离婚，带着四岁的女儿搬到儒安湾与朱安莱潘两镇之间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叫“勒吉开”，意思是“小山羊”。

她是拉米太太的表妹，20多岁，是在旅游旺季快要结束的时候被请来在制陶店帮忙的。她除了用不连贯的西班牙语哄巴勃罗高兴之外，几乎无事可做。巴勃罗给她起了个绰号：“杰”夫人。她的名字是杰奎琳·雨汀，但是到了瓦劳利不久，她就改回婚前的名字，重新成了杰奎琳·洛克。她从自己的生活中抹去了那位工程师前夫和他们在非洲生活的全部时间。她的女儿凯瑟琳·雨汀，是她与那段生活以及往昔与她仅存的联系了。

现在，杰奎琳花相当多的时间用西班牙语同巴勃罗聊天。她的目的很明显：她要专心致志地使巴勃罗分心。

1952年，巴勃罗所崇敬的名演员卓别林来到巴黎。巴勃罗在家里接待了卓别林。巴勃罗不会讲英语，卓别林不会讲法语。他们之间的谈话只好通过翻译员。巴勃罗事后对弗朗索瓦丝说：“卓别林现在的真正悲剧是他的外形不能再胜任丑角的角色了。他的身材不像过去那样瘦削，面貌也不再年轻，脸部无法再表现那些滑稽的‘小人物’的表情。他已经老了，时间已征服了他，而使他转变成另一个人了。”接着，巴勃罗承认，他与卓别林有不少共同点。他说：“他和我一样，是一个在不少女人身上遭遇过许多麻烦的男人。”

巴勃罗在政治上热情很高。他刚入党时，不仅被当作一位人民英雄，而且也考验了自己的信念。在过去的九年中，他出席各种会议，接见群众，为党的机关报《法兰西通信》和《人道报》提供素描和版画，甚至还为斯大林70岁生日作了一幅格调轻快的素描。画上，巴勃罗亲笔写的祝词是：“祝您健康，斯大林同志。”

1953年，斯大林去世的消息传来的第二天，作家阿拉贡打电话通知巴勃罗画一幅斯大林的肖像，紧急刊登在《法兰西文学》杂志上。巴勃罗感到十分为难：“我没见过斯大林，他的长相我一点都没印象。但巴勃罗是法共产党员，就勉强承担下来。巴勃罗根据1903年的一幅斯大林的照片画了一幅素描。阿拉贡取画的时候，不禁目瞪口呆。尽管如此，阿拉贡还是将这幅画像带走。发表后，继之而来的是法共内部同志的批评。他们认为巴勃罗画的像不够像个政治家，也不够尊言，各种报纸信件纷纷攻击巴勃罗。

《法兰西通信》上发表了党的各层组织寄来的愤怒的信件：“在这幅画像里，我们既看不到天才，也看不到智慧，也看不到慈祥以及在所有斯大林的照片中所看到的幽默，我们的毕加索同志完全忘记了他是为最先受到这可怕打击的工人们在讲话……。”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错误，因为我们热爱并尊重斯大林，

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认为这是我们作为共产党员的责任，要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画家安德烈·孕格莱写来的一封信说：“我愿意感谢党的秘书处对毕加索同志所作画像提出的批评，这幅画像不是真的想要描绘一下伟大的斯大林。这一纠正是绝对必要的……。”巴勃罗没有为自己或艺术的自由进行辩护。只是在这场风潮过后，他才生气地对阿拉贡说：“真是愚不可及！我在斯大林画像的前额上添了一绺头发，为的是让形象具有无产者的勇气，而那些人不愿意斯大林元帅是一员无产者，我看干脆把这幅画一砸了事！”他还出口不逊地说了几句非难“那些人”的话。

弗朗索瓦丝只身来到巴黎，设计《赫拉克勒斯》一剧的布景和服装。这段日子里，她经常和科斯塔·埃科洛斯在一起聊天。弗朗索瓦丝谈到她和巴勃罗同居时说：“当时我非常寂寞，他真是上帝派来的，起初看起来很自然，很随便，我丝毫没想到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当她谈到责任的时候，埃科洛斯说她完全是个懦夫，避免她同代人所作的种种尝试，而与一个凌驾于战斗之上的人在一起生活。当弗朗索瓦丝谈到准备牺牲个人幸福时，埃科洛斯说她实际上选择了最便宜的东西，也就是通过结合得到权力和地位。当弗朗索瓦丝谈到不愿让孩子失望时，埃科洛斯说她背

叛了自己。埃科洛斯从他个人的角度和哲学的角度对弗朗索瓦丝进行深谙劝导，使弗朗索瓦丝逐渐对她和巴勃罗住在一起的种种理由提出质疑。《赫拉克勒斯》夜场首演时，巴勃罗带着孩子们来到包厢并看到弗朗索瓦丝被宾客们蜂拥在周围时，向她致敬祝贺，便自言自语地低语：“芭蕾总给我带来厄运。”

回到盖鲁萨克路。巴勃罗开始用西班牙语写诗，诗中充满了孤独、暴力和痛苦。就在巴勃罗走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埃科洛斯告诉弗朗索瓦丝说他爱她，为弗朗索瓦丝离开巴勃罗增添了力量。弗朗索瓦丝说：“我终于得出结论，我认为我和毕加索的生活就像一场病。我知道我必须清除掉我身上的一切病毒。”而巴勃罗却说没有人会离开他这样的男人。这句话更加促使弗朗索瓦丝更快的离开他。她对他说：“等着瞧吧，如果没有人能离开像你这样的男人，那么，你就要看到你前所未闻的事了。”

弗朗索瓦丝的愿望实现了，10月初的一天，在巴勃罗目瞪口呆、满腹狐疑下，她和孩子们上了去火车站的出租汽车。

巴勃罗以往从不对人提起他的私生活，现在由于悲愤交加，见谁就跟谁说。弗朗索瓦丝和埃科洛斯的暧昧关系和她决定离开的流言开始传播了，弗朗索瓦丝被指责为自私、恶毒，最糟的是她不能理解我们时

代的天才。多米尼克·德桑蒂说：“关于她的闲话真是可怕，但是归结为一点，就是不要离开毕加索。那时，她还不是我的好朋友，我也不知道使她决定离开的全部理由，但作为一个女人，我能体会到她的心情。我理解她为了保持自己的个性所进行的战斗。到了一定的时候，如果她要活下去，就不得不离开。”弗朗索瓦丝的另一位辩护人是阿拉贡的妻子，她说，弗朗索瓦丝所能做的最有勇气的事情就是离开毕加索。并专门为弗朗索瓦丝写了一本称赞她的小诗歌。

弗朗索瓦丝的时间再也不属于巴勃罗了，而巴勃罗也把绝望深藏在心里，他又开始工作了。他发狂地工作着，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画出了180幅素描。在这些表示忏悔的素描中，他不仅衰老、古怪，而且丑陋、矮小、忧郁，他想要通过艺术捕捉生活中失去的活力，他的技术极为娴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是个超凡的艺匠，富于想象力和智慧，他运用了各种不同的艺术手法描绘他的模特和他自己，他的整个艺术事业上笼罩着一种无意义的气氛。

这段日子里，杰奎琳经常来陪他。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世上没有纯粹的欢乐或痛苦，甚至于幸福本身也需要付出不少牺牲来换取，而对于艺术家来说，则更是如此。在爱情上，拆散一对恋人，固然是件难事，但不管多么美满的一对情侣，若是老让他们厮守

在一起，恐怕更是件难事。”6月3日，他一口气完成了三幅杰奎琳的肖像。题目为《杰夫人》。

第六章 巴勃罗与《毕加索的奥秘》

弗朗索瓦丝走后，巴勃罗无法在瓦劳利继续呆下去。因此，他的朝廷便建立在佩皮里昂。在那里，拉则美伯爵夫人的出现使巴勃罗没心思注意杰奎琳了，他面无表情地向她表示，不想让她呆在自己身边。即使他对杰奎琳这样，杰奎琳也不肯走开，当巴勃罗把她带到大奥古斯丁路的时候，她就决定让自己的生活和意志都屈从于他，只要能够呆在他身边。

这个时期，友人相继过世，巴勃罗心里难免有孤独悲伤之感，他的好友保罗·艾吕雅的去逝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在保罗·艾吕雅病故后的好几天，巴勃罗一直在看保罗的《和平的面容》一书。这本书是保罗的一本诗集，里边的诗句都是依据巴勃罗的画意配写而成的。巴勃罗一边翻保罗的诗集，一面低声喃喃而语：“是啊，天才不必充斥许多观念，他理应恬静地生活！天才的脸上不留皱纹。”然而，就在他说话之时，深沉的悲痛，正在他的双颊上，刻下了沟纹。不久，“洗衣船”时期的老朋友英里斯·雷纳尔又去世了。巴勃罗痛苦万分。他的生活一片阴暗。

10月，他画了《坐在摇椅上的杰奎琳》：一个

渺小的杰奎琳，胖墩墩的，一幅家庭主妇的模样。这同6月份的那幅画相比，如天壤之别，那幅画像的造型是理想化了的，脖颈很长，像斯芬克斯一样。他现在画的杰奎琳并不是她当时的模样，但好似预言一般，她不久即会变成画像里的那个样子。杰奎琳已经选定了自己的命运，而巴勃罗也选定了一个照料他的女人。这样，在他为牵制死神而作画时，她就为他牵制住外部世界的干扰。杰奎琳是他能驾驭的女人。

1954年11月3日，马蒂斯于久病之后离开了人世。巴勃罗听到了消息，悲痛的心情难以形容。马蒂斯在尼斯寓所卧病多年的那段时间内，巴勃罗几乎天天都去看望他，并为他的病情而极度忧伤。马蒂斯的女儿玛格丽特打来电话，想通知他葬礼的安排，但没有成功。他不接电话，也不打算去参加葬礼。当别人请他谈谈对马蒂斯的去世的看法时，巴勃罗只淡淡地说：“既然马蒂斯已经去了，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真是斯人已去，何以言哉！

心情沉重的巴勃罗仍然把最主要的精力用在绘画上。他离不开绘画。巴勃罗说：“永远不会有这么一天你可以说‘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或者‘明天是星期天’。一旦你工作结束了，便意味着你必须重新开始新的工作。你永远不可能写出‘结束’这个词。他花费了许多时间去摹仿一些著名的画家的著名作

品。他觉得这个年龄有必要与那些已经死去的大师们在画布上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当然这不是简单的摹仿，而是再创作，是一些变体画。

马蒂斯去世一个月以后，巴勃罗开始创作 15 幅的系列油画和两幅石版画。这些画都是他根据德拉克洛瓦的杰作《阿尔及利亚女人》的变体。开始时还与德拉克洛瓦的原作者有些相似，透着一种宁静的气息。可后来，巴勃罗运用了移位、并列、分解等多种手法，使画中的妇女衣服、首饰越脱越光，粗浓的曲线勾画出硕大的乳房和滚圆的臀部。德拉克洛瓦画中的那种遮遮掩掩、欲露还藏的情欲全泛滥开来，恣意汪洋。对巴勃罗来说，激情变得那么宝贵。但安东尼·布朗特却认为，这些都不能掩饰他“某种想象力的稀释和某种隐藏在明显变化下的单一思想。”

巴勃罗曾对卡思韦勒说：“作为一个画家，你永远不会知道他的作品结果会是怎样，你动手画一幅画，这幅画却成了某种始料不及的东西。奇怪的是，艺术家的意图所起的作用是那么小。你身边总有一个批评家在说：‘我不喜欢这样’或‘应那样’，他抓住你的画笔，画笔变得像铅一样沉重。他在那里不知所云，可又不肯支开，真令人心烦。伦伯说得对：‘吾即他人’。”

巴勃罗的儿子保罗在一次手术中并发了肺结核。

他躺在医院里，已经濒临死亡，当时巴勃罗还有三天的时间才能完成他的《阿尔及尔的妇女》，他接到了要他去看儿子的电报，但他却没去。就在死神向保罗招手的时候，奥尔迦因患癌症死在戛纳的医院里。她在悲痛孤独中死去。这一切，丝毫没影响巴勃罗的创作。

尽管巴勃罗对奥尔迦的死、保罗的病感到黯然神伤，但他以旺盛的精力去做他喜欢做的事。绘画、看斗牛、拍电影等。

那些有西班牙著名斗牛士参加的斗牛，巴勃罗场场不落，而且总是坐在特别席里，担当斗牛主持人，像一个部落的酋长一样，庄严地主持这盛大的仪式。

那激动人心的精彩场面呈现在巴勃罗眼前：勇敢的斗牛士追赶着满身流血的公牛，最终将它刺倒，血像泉涌一样喷涌而出，一个崇高的勇士诞生了。巴勃罗熠熠闪亮的眼睛湿润了，他感到人的意志是那么坚毅，生活力是那么旺盛。每次看完斗牛，他都要与他的同胞通宵达旦地欢庆胜利。他用西班牙语讲述各种笑话，然后自己也开怀大笑，一切抑郁烦闷都一扫而光。回到住处，创作一幅又一幅的斗牛图。有一次看完斗牛回来，他竟然连续不停地作了350余幅斗牛图的版画。可见斗牛给巴勃罗带来了很大的激情。看斗牛，成了巴勃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件事。

在大奥古斯丁路，刚从巴塞罗那回来的《眼睛》杂志的女记者罗萨蒙德·伯尼尔来访问巴勃罗，并从巴塞罗那带来了在劳拉家拍摄的巴勃罗作品的照片。巴勃罗已19年没见到妹妹了，当他看到《节俭的一餐》一画的照片时，叫道：她可比我阔多了，瞧这幅铜版画，现在可值一大笔钱了！它竟然会在她那儿，我不记得了。”除了照片，伯尔尼还给他带来了存钱的罐子和棉花籽，使巴勃罗异常高兴，对他来说，伯尼尔给他带来的是来自另一世界的消息和信物。这是一个远离巴黎的世界，巴勃罗早已把它抛在了脑后，但仍和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当巴勃罗沉浸在巴塞罗那儿时的世界里的時候，弗朗索瓦丝打电话告诉他：她要结婚了。她要嫁给的那个男人是她学生时代的同学叫鲁克·西蒙。弗朗索瓦丝和鲁克·西蒙十几岁时曾是好朋友，在弗朗索瓦丝和巴勃罗一起生活的那些年里，一直没有见过面，但彼此通过信。当弗朗索瓦丝写信告诉西蒙她想摆脱巴勃罗时，他甚至为她在突尼斯找到过一份工作。去年春天，他们邂逅在圣日尔曼大街的雨思图书馆。“西蒙是一个很浪漫的人，31岁，年龄正好可以做两个孩子的父亲。孩子们也喜欢和他在一起，所以，我决定和他结婚。”她在电话里告诉巴勃罗。巴勃罗最初的反应是非常愤怒：“荒唐透顶，你只想着你自己。”

他怒吼着，忘 9 我把孩子带大。他不是他们的亲生父亲，；会成为一位好继父的，孩子们也会过上一种正常的生活。” 弗朗索瓦丝说完就挂上了电话。当杰奎琳走来问巴勃罗发生了什么事时 1，巴勃罗只说了一句：“她走了，她彻底地走了。”便径自向里屋走去。

巴勃罗不想留在巴黎，也不想返回瓦劳利，他在法国南部物色了拉加里福尼的一处别墅。这是一所装饰华丽的府邸，建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从那里可以俯瞰以香槟闻名的戛纳。

巴勃罗搬到拉加里福尼不久，尼斯的维克多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亨利·乔治·克鲁左想拍一部有关他的专题片。巴勃罗欣然接受。这部影片题为《毕加索的奥秘》。摄影师是印象派大师雷诺阿的儿子克洛德·雷诺阿，他记录了巴勃罗画在纸上的每一个动作。巴勃罗作画时用的是一种特殊颜料，可以透过纸背，使摄影师从纸的另一面拍摄一幅画的创作过程。

巴勃罗对电影这一新的艺术形式很感兴趣，在拍《毕加索的奥秘》这部影片之前，就参加过《格尔尼卡》和《从雷诺阿到毕加索》等历史片的拍摄。但这一次是初尝通过拍摄他的作画过程探索他的奥秘，要求非常具体、细致。克鲁左要把巴勃罗真实的作画过程完整地介绍给观众。巴勃罗不能单独作画了，他被摄制人员困在当中，灼热的灯光像正午的太阳照射着

他。巴勃罗突然有一种斗牛士登场的感觉。这一次不是他看别人斗牛，而是别人看他斗牛了。他拿起画笔仿佛拿起了斗牛的刺枪，一种勇气和毅力也渐渐升起，“开始！”随着克鲁左的一声令下，巴勃罗端着“枪”向“牛”刺去。

在拍摄过程中，巴勃罗一次次地重新开始，耐心极好，而且配合主动，他每次都被汗水渗透全身，像刚下场的斗牛士，有时他一天要工作 12——14 时。上百次的剪接和补拍，不仅干扰了巴勃罗的构思，而且也影响了他的健康。当别的演员关心地问他累不累时，他的回答总是“不累”。可毕竟，年龄不饶人。一次，他倒下了，拍摄不能不中断几天。影片拍完后，他又有好几个星期倒在床上。但是，神秘的力量有其自己的规律，比他累垮了的事更加有力。海伦·帕美琳写道：“真正的人永远不会疲倦，他们只是由于耗尽了气力而倒下——巴勃罗正是这样的人。”这句话勾画出了一个不知疲倦的巴勃罗的不朽形象。

影片终于成功了。首映那天，巴勃罗因身体不适而告假，但就在仪式的最后阶段，他穿着礼服，出现在放映场的正中央，全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巴勃罗在接受记者采访他成功的奥妙时说道，他并不存在什么秘密。他的艺术并不是神秘的东西。他说：“所有的人要理解艺术，为什么不去理解鸟叫呢？

为什么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去爱夜、爱花呢？绘画的时候，人们硬是非了解不可。”他说：“艺术家是随四面八方来的刺激的仓库。从天空、从大地、从纸片、从走过的物体的姿势和蜘蛛网等等，都不断地使我们感受到某种刺激。”巴勃罗停了一下继续说：“没有所谓形象的‘或非形象’的艺术。所有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形象’的伪装，连形而上学的观念也用象征性的‘形象’来表现。一个人，一个圆，一个物体，全都是形象。有些与我们的感觉接近，它们在触动我们的情绪时便会造成感动。其他有些东西则较直接地诉诸于我们的理智。我们的精神也完全和感觉一样，必须有一种事物使它感动。

巴勃罗在摄影棚工作的整个期间里，杰奎琳也在那里。杰奎琳和她的女儿被巴勃罗正式安顿在拉加里福尼。但不是每个人都了解底细，许多局外人都不知道她是谁。伊内丝也住在拉加里福尼，并常常到摄影棚来。伊内丝一开始就讨厌杰奎琳，而杰奎琳对伊内丝与巴勃罗有着20年之久的关系甚为妒忌。

第七章 夕阳更红

在拉加里福尼的第一个夏天，巴勃罗竭力想忘掉弗朗索瓦丝。但他怎么也办不到，这时，弗朗索瓦丝让女仆把克洛德和帕罗玛带到拉加里福尼度夏，自己则在威尼斯继续度她的蜜月。巴勃罗一想到曾经和自己生活过10年并有了两个孩子的弗朗索瓦丝现在正和一位年轻、高大、英俊的男人——她的合法丈夫在度蜜月，他就不能忍受，就感到心烦意乱。

由于帕罗玛患了急性盲肠炎，需要手术，弗朗索瓦丝当天就飞回尼斯，然后直接到瓦劳利，在那里等候帕罗玛。她回到拉加洛，发现房中除了床和几把椅子之外，所有的油画、素描，包括弗朗索瓦丝自己的画和书信以及个人用品全部不翼而飞。她立即打电话到拉加里福尼，问巴勃罗到底是怎么回事，巴勃罗回答说：“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都是你的，你不和我在一起了，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就这么回事。

“弗朗索瓦丝气得浑身发抖，但无话可说。她要求他立刻把女儿送回来，但巴勃罗却说：“没有人对我这样说过话。”这时弗朗索瓦丝已气得一团糟，她对着电话吼：“作为父亲，你这样不负责任地拿女儿的健

康来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你该挨耳光。”说完就挂上了电话。过了不久，保罗把帕罗玛送到拉加洛，弗朗索瓦丝立即把女儿送到医院。在医院里，巴勃罗每天来看女儿，但呆一会儿就走了。对此，弗朗索瓦丝说：“巴勃罗认为我深深地伤害了他，背叛了他，先是离他而去，而后再嫁给另一个男人。他认为，人人都应该站在他的一边，在那个地球上我就不应该再有朋友。因为我是那么不对，而他是那么正确。但那时我已经回到我的朋友中间了，他来医院，只想看看谁在这儿，以便把他们列入他的敌对分子的名单。他每次来医院都会看到他所不认识的人，那些人不属于他的世界，也不围绕着他的生活转来转去，所以，他不能忍受。”

帕罗玛一康复，弗朗索瓦丝就带着两个孩子返回巴黎，至今，她还没有要求过巴勃罗抚养孩子，或者给她经济资助。在巴黎，她卖掉了盖鲁萨克的公寓，并在格拉斯哥路买了一处尚未竣工的大房子。1955年秋天的一个周末，克洛德和帕罗玛与巴勃罗住在卡思韦勒的乡间别墅。当弗朗索瓦丝去接孩子的时候，巴勃罗告诉她说：“你如果不把你住处里的所有素描和版画交给保罗，你就休想把孩子从这儿接走。”弗朗索瓦丝回忆说：“自那时候，毕加索对我来说，已经不复存在——而依旧闪耀在我心头的甜蜜的记忆之

中的，只是我往日所了解的毕加索！此时，在我眼前呈现的，都是另一个人——尽管在公开的场合以及许多令人触目的喜剧式的场景中露面时，他的容貌仍然一如既往，对我来说，那旧日的他，已不复存在——墓穴已经被提前打开！那次接孩子，我什么话都没说，便掉头走开。唯一能得以慰藉的，就是在他的恼怒而变得生硬的瞳孔中，还能瞥见一股深邃的光芒。然而，在那一刻，我却毅然地下定决心：再也不去见毕加索。“第二天早晨弗朗索瓦丝让保罗把所有的画全部拿走了，除了那幅他作为礼物特意送给她的《女人和花》。随后，弗朗索瓦丝发现巴黎的画商没人敢买她的画，因为巴勃罗有言在先：从今以后，凡是她的朋友，就是他的敌人”。

剩下的，就只有杰奎琳了。现在巴勃罗和杰奎琳过着一种在相互吞噬过程中被对方吞噬的生活——她用那令人窒息的占有欲来吞噬他：他则首先摧毁她的精神，再摧毁她的人格。对杰奎琳来说，如果巴勃罗事事顺心，她也就事事顺心。杰奎琳是一个容易与人共鸣的人，是一个寄生虫。她的力量来自她所依赖的那种生活，在他尚未被宣告临床死亡以前很久，她就开始帮助他耗尽元气。杰奎琳成了秘书，管家，为他剪报，将他的意志付诸实现。而巴勃罗，则成了她对世界上其他人贯彻其意志的工具，成了她体验权力感

的手段，这种权力感，是她过去从不敢想象的，哪怕她的想象力不受任何限制。

在他刚搬进拉加里福尼的时候，特意从纽约慕名而来的海伦娜·鲁宾坦想请他为她画一幅肖像，当巴勃罗在接待她时却说他只给跟他睡觉的女人画像，气得海伦娜冲他只叫“魔鬼”。谁也逃不脱他的诡计，他的入木三分的讥讽和他的任性。他还在大奥古斯丁路时，那时他跟拉波特的关系很亲密。有一次，拉波特特意去看巴勃罗，在途中，得知考克托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消息。当时她想，巴勃罗一定也会为此事而感到同样的喜悦。因为考克托迫不急待地想得到这种荣誉。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他的诗人同行们一生都难以企及的幸事。但使拉波特大为惊讶的是，巴勃罗对她的话竟漠然置之，他当时正在绘制一幅风格幽默的作品。画面上出现的是一间陋室，床沿上坐着一对腹大腰圆的中年男女——他们神情迟缓，又都悠闲自得。女人正在阅读一张报纸，男人则在修剪自己的脚指甲。拉波特接过巴勃罗向她递过来的这张画，画上的每根笔触都刻画着丑恶、平庸和愚蠢。他用嘲讽的口吻说道：“你瞧，这个女人正在念一则新闻：考克托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可她的丈夫对此却无动于衷，他一心在修剪脚指甲。”巴勃罗的此一态度，使拉波特不寒而栗——他的画笔怎么会蘸有如此

诡黠而强烈的恶意。

考克托有时也意识到巴勃罗对他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巴勃罗于60年代曾称他为“讨厌的雪人”，对他的画也不乏贬意：“考克托老是模仿我的风格。作为报复，考克托也回敬了一句：“毕加索想奢谈玄学，但又对此一窍不通。”

1956年10月25日，巴勃罗75岁。他越来越难以用挑战的姿态展望未来，寻求新的冒险和新的事业，寻求他的灵魂所渴望的超然状态。但是，全世界的人都要为他祝寿，并先后去纽约、芝加哥、费城举办盛大的《毕加索七十五寿辰展览会》。来自各地的信件、电报和礼品潮水般向拉加里福尼涌来。法国共产党瓦劳利市委为他举办了盛大的生日宴会，有祝词、有焰火、有鸽子，还有许多来宾。莱里斯夫妇、卡思韦勒等老朋友都来了，出版商去斯陶·吉利则同夫人特意从巴塞罗那赶来，巴勃罗曾为他的《斗牛》杂志插过图。当地党组织送一只巴勃罗一直想要的山羊做礼物，后来，那只山羊总是拴在花园里的青铜山羊雕像上，散发着一股骚味，但谁也不敢吭气。

1957年，巴勃罗又摹仿了委拉斯凯兹的《宫娥》绘制他的变体画。委拉斯凯兹在这幅巨作中表现了画家、模特、观众的和谐关系，画面十分优美，然而巴勃罗却用立体主义的手法放大了空间，画面激荡

而凌乱，委拉斯凯兹原来的人物虽然还在，但已从温文尔雅变成了狂暴和狡黠。这些大大小小的变体画共有20来幅。自从画《宫娥》的变体画以后，巴勃罗的健康面容开始变得一天比一天憔悴。

一个多日的时间里，巴勃罗一直把自己锁在画室里，同那位17世纪的西班牙大师展厅了搏斗。但这都为了什么呢？连他自己都说不清。他在拼命地工作，也不断地满腹牢骚：“多可怕的事业啊。有人总以为创作一幅油画就是往画布上涂颜色，这桩事业要比死在角斗场还艰难，其实就是死在角斗场里。”巴勃罗很清楚没有激起新鲜热情的东西，就不能保证自己在崇拜者圈子里的位置。这位26岁时曾以《亚威农少女》一画向世界及世人挑战的大师，在76岁的今天，却在寻求一条稳妥的道路，对那位17世纪的西班牙绘画大师已经画过的题材作出自己的阐释。

巴勃罗曾屡次被冠上“魔术师”的称号，这无疑是因为被他的手碰过的东西，一瞬间便成了美的梦幻般的奇妙世界，从而使看到的人产生一种满足的感觉。巴勃罗输送敏锐的感受力和变幻无穷的想象，给一切在普通人看来很平常的东西一种新的生命力，使人们想起新的世界。正如有人所说，对于普通人是终点的地方，对巴勃罗则成了出发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请他为巴黎总部前厅绘制一幅

1000多平方英尺的壁画，巴勃罗欣然接受。巴勃罗把这幅画命名为《依卡洛斯的坠落》，后来被重新命名为《生命与精神的活力战胜邪恶》。画中的依卡洛斯是希腊传说中的人物，他用蜡造的翅膀在天空中飞翔，飞近太阳时其蜡翼融化，以致坠海死亡。巴勃罗用这种寓言方式的壁画暗示人类固有的生命力及精神力量终将战胜威胁着人类安全的邪恶势力。这张巨大的壁画是以儿童画的技巧与形式画成的。这种形式使它的内容更富有讽刺意味。

1958年5月，戴高乐重新掌权，建立了第五共和国。大约与此同时，巴勃罗创作了《静物与公牛头颅》，这是一幅描写暴力的油画。蓬罗斯写道：“在这幅画里，燃烧着红色与黄色，太阳在开启的窗内双重反射。前景画有带角的颅骨，纪念碑式的静止产生出一种震撼，像是在遥远蓝天的宁静中，由一声死一般的爆炸所引起的。”巴勃罗曾对蓬罗斯说：“我是用骂人的脏话画这幅画的。”他的党内朋友很是高兴。一幅作品终于画成了，正好在戴高乐掌权的这一天，可以说这是一幅政治性绘画，矛头直指“毕加索所看到的巨大危险，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的危险”。除政治动机以外，蓬罗斯认为，巴勃罗还从一场刚刚看过的极为出色的斗牛中获得了灵感。实际上，巴勃罗创作一幅表现愤怒和感情突变的作品，并不需要外

部世界的刺激。他自身即是这两种情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可以随时供他汲取。

巴勃罗太疲倦了，他隐居起来了，他不再更换女人了。但是，只要生命还能忍下去，他总要更换些什么。于是，他决定换房子。拉加里福尼太拥挤了，随着戛纳近年来的发展，这所房子也不再隐蔽了。库珀告诉他说：在埃克斯昂普罗旺斯附近有座沃夫纳尔格堡，那是个很不错的地方，现在正在出售，他建议巴勃罗把它买下来。

18世纪时，沃夫纳尔格侯爵曾住在这座城堡里，而且，据看房人说，曾在这里写下了其著名的《格言》一书。19世纪，塞尚曾用他的画笔使这座城堡所处的圣维克多山成为不朽的名山。而现在，20世纪，巴勃罗拥有了它。数百件油画和青铜雕刻从巴黎银行的拱室运往这里，塞满了沃夫纳尔格堡的房间。城堡里安装了暖气，还有一间豪华浴室，他不久就在浴室的墙壁上画满了热带丛林半人半羊的牧神和仙女，澡盆的上方是一只野兽。2月，他搬入城堡，开始在拉加里福尼公寓和沃夫纳尔格堡之间穿梭往来。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再次证明，巴勃罗是一位罕见的天才。

1959年春天，巴勃罗画了一系列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素描，像在许多痛苦的时刻一样，他对基督的热情是一贯的，但在这一贯里，没有慰藉，没有解脱，

他身边的人把他神秘的诱惑力和对他的实际体验区别开来，发觉巴勃罗正处于“令人不堪忍受的情绪中，”他的情绪统治着这座城堡，使人窒息，有时，甚至使人渴望逃开，去吸一吸自己的空气，远离他那令人压抑而沉闷的空气。巴勃罗越是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么有力量了，就越像个暴君。他开始创作组画《骑马斗牛士的罗曼采罗》。画中，那位斗牛士被贬成了一个无动于衷地偷看淫秽场面的家伙。他钻进妓院，姑娘们跳着舞，卖弄着风骚，用各种挑逗性的动作想在他身上点燃一些生命之火，而他却出奇的无动于衷。这组画反映了巴勃罗的生活好像干涸了一样。新的城堡带给他的兴奋才维持了几个月，如今已烟消云散了。于是，他就又买了一座号称“维埃圣母院”的别墅。这所房子位于俯穆更的一座小山上，是一所与世隔绝的普罗旺斯式别墅，周围种满了柏树和橄榄树。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这里。房子已年久失修，但内部已修葺一新，房内都是白色的，备有许多现代化的洗澡间，巴勃罗很喜欢，立刻搬了进去。

1961年，巴勃罗摹仿了马奈的名作《草地上的午餐》，这组变体画数量之多令人咋舌，共170多幅，其中油画27幅，素描138幅。这幅画表现了他与杰奎琳关系的矛盾心理和他日益加深的恐惧。在这幅《草地上的午餐》的变体画中，巴勃罗成功地

把他们的身体加以变形，直到他的身体“在最后的油彩中萎缩成恰如其分的一片绿荫，而他对面坐着贪婪地左右一切的杰奎琳”。显然是由于他已预感到自己的力量在衰微，他害怕杰奎琳将来的权力。

就在这一年，弗朗索瓦丝为了给克洛德和帕罗玛争得巴勃罗的姓氏权力，不得不和西蒙离婚。而就在弗朗索瓦丝同西蒙离婚的同时，巴勃罗和杰奎琳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结婚，这个消息一直隐瞒了12天才在报纸上披露出来。

在巴勃罗80岁生日时，他所居住的瓦劳利市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这次祝寿可以比作“文艺复兴时代的圣诞”。巴勃罗和杰奎琳徒步跟在警察的摩托车后面前往参加。吉它手为他演奏小夜曲，他收到无数的礼物，听了许多赞扬他的伟大和人道主义的演说，他出席了戛纳棕榈滩游乐场为他举行的招待会。此外还有盛大的焰火晚会，并为他在瓦劳利举办了一场斗牛。当有人问巴勃罗为什么他和他的画都能保持青春时，巴勃罗幽默地说：“因为我们互相学习。”他还对《法兰西晚报》的女记者茜尔维·玛利翁说：“如果没有镜子的话，我就不会知道自己的年龄了。你应该这样写：毕加索说，爱情是唯一重要的事。”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向他颁发“列宁和平奖金”。

巴勃罗越到晚年，越怀念自己的祖国西班牙。当

他听到巴塞罗那市正建一个毕加索博物馆的时候，他的心情很激动。巴勃罗没有忘记他早年时在西班牙——自己的祖国所受到的教育，他立即表示支持巴塞罗那建立毕加索博物馆的建筑工作。

巴勃罗与外界的联系隔绝了，他的生活中几乎没什么与爱情有关的事了，在这种隔绝的生活中，他继续工作，创作油画、素描、麻胶版画。仅1962年，他就画了70幅杰奎琳的肖像，但这是痛苦和痛苦所带来的疯狂所产生的作品。在生活中和作品中，他都在退化。这是他的放弃、安顿与回归的时期：放弃发掘现实和真理的希望；安顿下来，仿佛生活的重压已使他付出太多的代价，终至不得不和照看他的人结婚；回归到母亲的怀抱，由她来安排他的现实，满足他的愿望，而她却不要任何报答只要拥有他。他开始称杰奎琳为“妈妈”。

在他的作品中也表现出退化——不但是退回到他自己的早期，而且是退回到更早得多的人类的早期去了。画布上簇拥的人物都不是现代人，甚至不是埃及人，也不是希腊人。他们是些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人，是我们在幸存下来的古代艺术中所见到的人物：粗壮，蹲伏着，几乎没有颈部，尤其是瞳孔空悬在眼睛里，没有一处靠着眼睑——是大而黑的洞，从宇宙的黑暗中显露出来，胆怯地凝视着，仍然在原始恐怖的掌握

之中。10月底，他开始创作《劫夺萨宾女人》，画中的四个武士显示了那种原始的恐怖。11月14日，巴勃罗画了一幅杰奎琳的肖像《女人头像》，他把“对武士面孔的变形，以及他们所有的恐怖”都表现在杰奎琳的肖像上。

1963年，他又画了160幅杰奎琳的肖像，仿佛自从杰奎琳在他生活中出现以来，他不得不在作品中摆脱她。在他一幅油画和一幅素描中，杰奎琳的身体被屠杀着。她曾说：“有时候，我梦想他爱我。但那梦一定难以挽住，因为随着岁月流逝，她在他的画笔下越来越变成了野兽。”

这时，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正式成立，在成立前夕，负责筹建的人多次访问巴勃罗，同他亲自商量博物馆内陈列和展览秩序。巴勃罗同他们讨论得很细致，甚至讨论到哪些作品要放在馆内的哪个房间的哪个位置？哪些作品要悬挂原物，哪些地方要悬挂复制品等。

使巴勃罗高兴的是，他的好朋友沙巴德斯被任命为毕加索博物馆的名誉馆长。巴勃罗高兴地对他说：“现在，我们俩都担当了同一类职务。”巴勃罗仍没忘记他仍然是普拉多博物馆的馆长。巴勃罗还说：“只有你才能去赴任，而我却不能。”巴勃罗痛恨佛朗哥政权，使他一直没机会回到祖国正式赴任。现在，

他只能对朋友寄予重望。

就在这一年，他漫长一生中最好的两个朋友相继去世。8月，勃拉克去世。10月，考克托去世。这两位现代艺术界的明星陨落，使巴勃罗感到震惊。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接近完结。从此以后，他不在公开的场合抛头露面了，紧闭着住宅的大门，谢绝任何人来访。

1964年，弗朗索瓦丝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有关他和巴勃罗私生活一书的摘要。随后《与毕加索一起生活》一书在纽约出版。巴勃罗愤怒了，讨厌公开透露他的私生活。首先，他要求法庭取缔《巴黎竞赛报》连载该书的版权，提出的理由是，对他私生活“不可容忍的侵犯”。他输了这场官司。接着，他对弗朗索瓦丝的出版商卡曼·莱维采取行动，要求法院查禁该书。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驳回了巴勃罗的要求。

挫折、愤怒和绝望，都注入了他的作品。他又开始作画了，性的期待、性的行为和性的回溯便成了他许多作品的主题。他所失去的是欢乐的能力，这反映在他的眼睛里。他曾说：“到头来，一切都返朴归真。腹中的太阳万道光芒，其余都是子虚乌有。”如今他却对比依说：“有朝一日，年老力衰，你才会懂得一切。”这是他最为坦率的承认，他腹中的太阳已今非

昔比了。马尔罗在谈到巴勃罗面对死亡作画时曾这样写道：“面对另一个世界作画，即便是空无所有，也不同于面对现实世界和画，尽管只是作画而已。”这时，巴勃罗已是坐着而不是站着作画了，身体弯在画布前，像一只虾。

1966年10月，为了庆祝巴勃罗85岁大寿，巴黎举办了一次场面宏大的毕加索作品展览会，会上展示了大量的油画、雕塑、陶制品、版画以及其他画种的作品。前来参观展览的人数达80多万。

展览时，油画在大展览馆展示，雕像在小展览馆展出。这时他才相信这次展览从一开始就是他思想的产儿。他在《毕加索的假面》中，称这是“我在1966年举办的回顾展”。这次展览的确意义重大。让·雷马在展览图录的导言中写道：“毕加索统辖了本世纪，正如米开朗琪罗统辖了他那个世纪一样。肯定还有更多的东西有待人们去认识，他名字的三个音节回荡在我们的世纪中，而他这颗巨星至今还没有停止使我们震惊，没有停止对我们施以魔法。”在一次有关此次展览的专题广播节目中，一位牧师在电台宣称：“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尚未谱写，人们可以在毕加索的作品中读到它。”

巴勃罗越来越发狂似地作画，画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快。1966年12月，他患肝炎后仍在恢复期

中，便又开始作画了。作品中的人物是17世纪的士兵，巴勃罗称他们为剑客。他在闲暇无事的那段时间里，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伦勃朗，这时，那些剑客来到了他身边，巴勃罗要努力在有生之年再多画几百幅作品。他把阳台封闭起来，改成一间附加的画室，他抱怨说，没有足够的地方让他画画了。则尔沃仍继续为他的每一件作品拍照，包括他的油画、素描和蚀刻铜版画。对于巴勃罗来说，时间逝去得越多，他就越是关心保护自己的作品，并关心最终能获得他所梦想的绘画——他毕生都在梦想着的绘画。工作成了巴勃罗唯一的精神满足的源泉。“我只有一个念头：工作。”他说：“我画画有如呼吸。我工作才感到轻松，无所事事或招待客人使我感到疲倦。”他又说：“我讨厌跟人们浪费时间。不仅是现在，而且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一贯如此。”工作逐渐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其他一切都被挤得无影无踪，他好像离开人的本性，和那终极绘画也更远了。他甚至想要对此作出说明：“超乎寻常的东西是画一幅与现实混然一体的图画，要绝对无拘无束。绘画既要涵概一个特殊女性的一切，但又与人们所了解的她毫无相似之处。”他极力捕捉在画上看不到的东西，与他话里的东西倒最为接近。

10月25日是巴勃罗85岁诞辰纪念日。在这一年，为了庆祝巴勃罗的伟大成就，在世界各国的许

多首都和大城市都分别举行了毕加索展览会。11月19日，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主持了在巴黎大皇宫和小皇宫举办的大型毕加索展览会。

当进入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巴勃罗决定把散存在西班牙各地家属中的作品送给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其中包括82幅油画、681幅版画和21幅其他艺术作品，此外，还有17本素描册，四册附有大量边画的书(巴勃罗在这些书的空白边页上画了不少插画和草图)和5件有纪念意义的实物。上述素描册共有500多页，反正两面都画满了素描。

接着，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馆长还亲自到法国牟晨市访问巴勃罗，把巴勃罗家里的许多有纪念意义的东西都拍摄下来。巴勃罗看到这一切，心里很高兴。他站在他家中的花园里，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但是，当馆长问巴勃罗何时回到自己的祖国时，他的脸立刻沉下来。他因祖国在佛朗哥的独裁专制统治下而感到伤心。他很清醒地告诉馆长只要佛朗哥专制政权一天不倒台，他就不回西班牙。馆长问：“佛朗哥死后呢？”他回答说：“代替他的将是另一个同样顽固的将军。”交给巴塞罗那博物馆的全部作品，只是巴勃罗青年时期的作品。

巴勃罗越来越孤寂，他不见任何人，包括他的孩子们。1971年10月，庆祝巴勃罗90寿辰的时

候到来了。在生日前夕，当他的朋友鲁吉德为举办新展览而访问他时，鲁吉德和巴勃罗本人都为作品太多以致无从选择而发窘！巴勃罗仅仅在1970年12月31日至1971年2月4日之间便画出了57幅画以及其他大量的素描。这些画往往都同时画在同一画布的正反两面。

为了庆祝巴勃罗的90岁生日，法国政府在巴黎卢浮宫博物馆举办了新的毕加索展览。法国总统蓬皮杜亲自为展览会剪彩，并发表了演说：“毕加索是一座火山。不管他是在画一张妇女的脸，还是在画一个丑角。他都始终同样地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毕加索永远都像初升的太阳那样朝气蓬勃。他的大脑是永不枯竭的喷泉。”

就在人们为他的90岁生日而忙得不可开交时，巴勃罗静悄悄地庆祝了自己的90岁寿辰。杰奎琳送他的礼物是在维埃圣母院安装了电梯。

在他的生日还没到来之前，西班牙报纸谣传巴勃罗回到西班牙看斗牛。巴勃罗在法国报纸上辟谣说：“有人说我去过那里，那不是真实的。为了斗牛和展览会揭幕仪式，我确实必须到那里去。但我现在还不能去——至少，在佛朗哥专制政权还统治西班牙的时候，我不能去。”“此外，我的时间全占满了工作。我没有哪怕一秒钟的空闲时间去想别的事情。每天晚上，

我都呆在画室,直到深夜。”他的工作的确太重了,他决心以繁忙的工作扼住死神的咽喉。

“你过的是诗人的生活。”巴勃罗对杰奎琳说,“而我过的是囚徒的生活。”1972年6月30日,他直视着那使他消耗殆尽的恐惧,并把它画了下来。这就是他最后的一幅自画像。第二天,皮埃尔·戴克斯来拜访他。”昨天我画了一幅画,“他对戴克斯说:“我认为,在这幅画中我已触及到了某种东西……不同于我历来所画的东西。”他拿出那幅画,举到面前,然后又放下,未置一辞。这幅面孔凝结着痛苦,充满了原始的恐惧,更近于长期以来他所戴着的、曾愚弄了许多人的那副面具。

直到1973年春天,巴勃罗仍然在努力地工作。他在起居室隔壁幽暗的画室里,完成了伦勃朗《驯鹰者》一画的变体,巴勃罗称它为《玩鸟的人》。在这件作品中,他把“驯鹰人机警的目光变成了一个偶像的惊恐的凝视”——那卷起来的自画像的凝视。那年年初,巴勃罗听到波普市阿维农广场举办他的画展,他就兴致勃勃地、但又极端秘密地同杰奎琳一起去参观。他高兴地看到自己的作品得到了那么多人的欣赏和赞扬。不久,在同一广场又举办了第二次毕加索画展,巴勃罗把自己1970年9月——1972年3月的201件作品寄出去。

但是，巴勃罗终于在1973年的4月倒在床上。全世界各地打来许多电话连续不断地传到巴勃罗晚年居住的牟晨市。杰奎琳一次又一次地安慰和感谢询问者，甚至还说：“毕加索没有停止工作。”是的，他又拿起画笔继续工作。

4月7日晚，巴勃罗吃完晚饭，对杰奎琳说，我要工作了，说完上了楼上的画室。这时巴勃罗正患流感。第二天凌晨巴勃罗倒下了，巴黎的医生火速赶到，巴勃罗慢慢睁开眼睛，指着自己的妻子杰奎琳，用微弱的声音对这位他认识的单身医生说：“结婚……很……好，你……不结……婚……错了。”说完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这是1973年4月8日上午11时。

巴勃罗一生勤奋作画，涉猎又广。他创作了数以万计的油画、版画、素描、雕塑、壁画、拼贴画和拼集式作品。此外，他还从事过陶瓷、舞台设计与制作，写过诗歌与电影、戏剧剧本。不过，他的博大恢弘，显然不限于此，而更能显示其精神实质的，则是他的“永远不满于现状”的创新热忱。保罗·艾吕雅在《法兰西文学报》为巴勃罗70大寿而出的一期专刊上所写的贺词中，把画家赞之为“世界上最年轻的艺术家的”，所阐明的，正是他的艺术活力的核心。

他热爱女性，他的艺术和生活都离不开女性。他

大胆追求自己爱恋的女性，对她们有着海一样的真挚和火一样的热情。但他又是一个性追猎者、性变态者、性虐待狂。他对异性有着神奇的魅力，使她们聚拢在他的身边。他则在生活中和艺术中蹂躏她们，毁灭她们。他把对性的探索看作是一件正经的事，并把这种探索表现在他的艺术当中，也表现在他的生活当中。

巴勃罗是一个矛盾、复杂的人。他的一生都是与这个世纪的命运紧密相联、休戚相关的。他活了92岁，是世纪的见证人。

巴勃罗死了，死在了自己的作品中间。他曾对一位西班牙斗牛士说过：“回到斗牛场吧，在那里死得其所。”巴勃罗终于壮烈地倒在了自己的斗牛场上。他临死的最后一幅作品是《带剑的男人》。

几天后，巴勃罗的灵柩在古老宗教的经文声中，缓缓地降落在一个孤冷的墓穴里，但巴勃罗不会感到孤冷的。他终于在那里见到了委拉斯凯兹，见到了德拉克洛瓦，见到了马奈……还有一大批早以辞世的著名艺术家，巴勃罗的名字早已跟他们排在了一起。